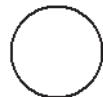


红旗

HONGQI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12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五八年 第十二期

目 录

駁工业战线上群众路線的怀疑派 本刊評論員 (1)

长春汽車厂为爭取年产十五萬輛汽車而奋斗 鏡 瓣 (7)

在大型企业中貫彻群众路線的一面紅旗 刘志兰等 (12)

插紅旗, 拔白旗 中共湖南省委會 (16)

从是否“已經到了共产主义”說起 許立群 (20)

发揚共产主义的劳动精神 王 力 (25)

抓住时代的精神 关 锋 (29)

是少种多收好, 还是广种薄收好? 中共石楼县委會 (31)

开展大面积的高額丰产运动 閻达开 (35)

一个办得很象样子的公共食堂 范若愚 (38)



駁工业战线上群众路线的怀疑派

本刊評論員

党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議以后两个多月時間內，在我們的国家里发生了三个大規模的群众运动，即：在农业大跃进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大办鋼鐵为中心的全民工业化运动，以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結合为特征的文化革命运动。

全民大办鋼鐵大办工业的群众运动，是工业化方法的革命运动，它能够把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速度提到从来没有过的高度，已經是众所公認的事实。但是它的意義决不止此。我們还应当看到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深远影响。

几千万人办鋼鐵，更多的人办工业，发揚了人們敢想敢說敢干和要干就大干的作风，彻底破除了工业神秘化的迷信。許多从来沒有见过鋼鐵厂的人，現在自己动手建設高爐和轉爐；許多从来不知道矿物是什么的人，現在自己动手开采铁矿和有色金属矿。許多現代化企业中的职工群众，同样打破了陈旧的規章制度，在生产上技术上創造出千千万万的奇迹，过去認為无法做到或者要許多年才能做到的事情，現在苦战几昼夜就做到了。这种风格，是共产主义风格。有了这种风格的人民群众，使工业群众运动大放光彩；而大規模的群

众运动，又使共产主义风格更加发揚光大。

全民办鋼鐵办工业的运动把我国五亿多农村人口进一步动员起来了。广大农民象在历次革命斗争中一样，坚决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在工业化运动中貢献了伟大的力量。正是因为这样，我們在农村中就建立了亦工亦农的基础。这就是在实际上为开始共产主义所要求的消灭城乡之間的差別和工农之間的差別的工作准备条件。

全民办鋼鐵办工业的运动又把所有的学校、机关、团体、商店的人员以及城市街道居民都动员了起来。这些人中间的大多数是脑力劳动者，現在大量地經常地参加体力劳动，就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結合，开始为消灭这两种劳动形态之間的差別創造了条件。

工业战線上大搞群众运动的必要性，已經愈来愈明显，愈来愈被人们理解了，但是也还有人怀疑，有人非議。究竟是党的方針正确还是他們的意見正确，这是每个人都必須弄清楚的問題。

一、“天下大乱”还是天下大治

正象历次革命运动中必然会发生那样，对于全民办鋼鐵办工业的运动，也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說好得很，有些人



說糟得很。說糟得很的，又有各种各样的人。帝国主义分子和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他們說糟得很，毫不足怪。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們革命队伍中，也有很少数人說糟得很。他們不甘于“觀潮”，而站出来“挡潮”。这种人為数虽少，但是障碍却不小，因而值得注意。

“挡潮派”对于全民工业化运动的看法：一曰“搞乱了生产秩序”，二曰“破坏了比例和平衡”，三曰“造成紧张”，四曰“得不偿失”。总而言之，他們認為全民工业化运动造成了“天下大乱”，不是了不得而是不得了。

一点也不錯，現在确实是象他們所說的“天下大乱”了。无论在城市和农村，也无论在机关和学校，到处是炼鐵炼鋼的熊熊烈火；在荒山和曠野，到处是开矿和运输的人群；工厂和公社里到处有学生和干部，而教室里到处有工人和农民。农民們在一亩土地上收几万斤粮食，工人們一天几次打破定額，用小机器制造大机器，許多粗具文化的人創造出科学家难以創造的新技术，青年学生們自己編寫教科書，党委書記和工人們一起睡在高爐旁边，几百万工人和农民学习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以及吃飯不要錢等等，諸如此类的事情，都是古今中外所沒有看見过的。但是，难道不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天下大乱”，我們的國家才更加兴旺，我們的人民才更加奋发，我們的事业才发展得更加快嗎？这种“天下大乱”，实則是天下大治。有了“乱”才有治。这种

“乱”，是革命的人民万分欢迎的。只有那些对革命厌倦的人，才对“乱”害怕和不满。

要不要維护生产秩序？当然要，而且我們正在为了加速社会主义建設而努力建立新的生产秩序。在党的八届二次大会上，党根据毛澤东同志历来的主张，确定了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的方針；以后，又确定了“土”法生产和“洋”法生产同时并举和互相結合的方針。在不久以前，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又重新強調地指出，办工业必須大搞群众运动，“土”法生产的小型企业要大搞群众运动，现代化大企业也要大搞群众运动，同时指出了工业化运动的中心必須是鋼鐵和机械。这样一系列的方針，就是我国实现工业化的基本路綫。我們必須按照这条路綱，建立新的生产秩序。这样，就决然要搞乱所謂“正規化”的旧的生产秩序，即那种冷冷清清少数人办工业的生产秩序，那种自上而下用行政命令办工业的生产秩序，那种只强调技术不注意政治、只强调物的作用不注意人的因素的生产秩序，那种只顧大“洋”不管小“土”、只顧中央不管地方、只顧工业不管农业的生产秩序。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生产秩序不破坏，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生产秩序就不能建立，这不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嗎？

社会主义經濟的发展必須有計劃，必須按比例和組織平衡，問題在于怎么样按比例，怎么样組織平衡。在有些人看来，比



例是固定不变的，平衡是絕對的，神圣不可侵犯，一时一刻也不能被“破坏”，否则就要发生脱节現象，造成天下大乱。他們按比例和組織平衡的方法，就是指标乘定額（即外国的或者本国过去的生产結果），算出一个数字，用同样的方法又算出第二个第三个……許許多多的数字，最后又归結到第一个数字，就此得出結論說，这些多了，那些少了，这样平衡了，那样不平衡。对于这样的觀点和方法，毛澤东同志曾經不止一次地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他說：“世界上沒有絕對平衡发展的東西”，“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觀規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級。”这不是很清楚嗎？國民經濟在发展中并沒有什麼絕對的經常的平衡状态，也并沒有什麼絕對的固定不变的比例。万万千千的事实証明了毛澤东同志的論斷完全正确。人民群众就是按照毛澤东同志所指示的从不平衡到平衡再到不平衡的原理，来突破計劃、超过指标、打破比例、打破平衡的。对于这样的革命行动，我們为什么要表示惊慌而不表示欢迎呢？

我們社会主义建設最重要的問題是速度問題。比例和平衡的安排，应当是积极的，不应当是消极的；应当服从于提高速度的要求，而不应当妨碍这个要求。但是有些人却不是这样認識，他們主张，为了按比例和达到平衡，应当限制速度。这明显地是一種本末倒置的主张，是为比例而

比例、为平衡而平衡的主张。按照这种主張去办事，只能促退而不能促进經濟的发展。我国人民群众有魄力以世界上最高的速度发展生产，当生产的某些环节出現薄弱状态的时候，也有力量去消除这些薄弱环节。在不久以前，当鋼鐵的“小土群”运动猛烈地发展起来以后，不是一度感到煤炭不足嗎？就在这个时候，許多地方就放出了煤炭的高产“卫星”，使煤炭的生产大体上适应于鋼鐵生产的需要。这个例子只是許多例子中間的一个，但是它已經可以完全駁倒上述某些人的錯誤觀點。

在按比例和組織平衡問題上，还有一些人担心鋼鐵这个重点太突出了，要挤掉一些东西，或者别的方面跟不上，就会破坏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比例，造成不平衡。这种看法也是不对的。以鋼鐵为中心安排整个工业建設，这是一种以重点带动一般的方法。在今年，我們把一千零七十万吨鋼作为工业生产的中心，固然挤掉了一些东西，但主要是带动了各个方面；挤掉的只是次要的方面，带动的却是主要的方面；而且某些东西被挤掉是暂时的，不用多久又会被带动起来。应当看到，在次要的方面有所不为或少有所为，才能在主要的方面大有所为。今年为了保証鋼产量翻一番，我們的机械制造工业、煤炭工业、电力工业和交通运输业都有了很大的跃进，許多产品的产量将增长一倍或者几倍；我們的化学工业、石油工业、有色金属工业、水泥工业、木材工业也被带动起来，有了很大的跃进；我們



的輕工业的发展速度，也大大超过往年。如果沒有一千零七十萬噸鋼的“壓力”，上述許多部門是决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跃进的。

突出重点，当然就要有全面安排。重点突出和全面安排也是对立的統一。我們抓紧了鋼鐵和机械两个主要环节，当然不是說可以不管其他。在重工业各个部門之間，在重工业和輕工业之間，工业和农业之間，生产和流轉之間，都应当有全面的安排。即使鋼鐵生产本身，也存在着全面安排的問題。例如炼铁炼鋼能力有很大跃进以后，必須使轧鋼和采矿很快跟上去。这里所說的全面安排，主要的一是劳动力，二是生产資料。

“一馬當先，万馬奔騰”，這是我們需要的形势。在今年，我們的經濟戰線上已經出現了这种形势，我們的整个社会主义建設事業也已經出現了这种形势。

大規模的工业群众运动，鋼鐵带头一馬當先，必然会使各个方面都紧张起来。所謂紧张，无非是說，形势逼使各个方面的工作尽快地赶上去，促使所有的人尽快地进步，因此是好事而不是坏事。紧张使人們的精神状态更加奋发，去想更多更好的办法。千方百計，都是逼出来的；不逼，一方一計也难有。紧张正是革命的常規。不甘于落后，要革命，就得紧张起来，我們对于这种使社会主义事业高速度发展的紧张，应当举起双手迎接它。

有些人看到土爐子小爐子炼铁炼鋼多用了一些煤炭，多花了一些劳动力，就認為

是“得不偿失”。他們引用許多資料，算了很多次賬，來証明群众办工业浪费很大。他們就是不算大賬，因此看不見我們得到了什么。他們也不去想一想，一千零七十萬噸鋼有什么意义，几千万人炼铁炼鋼又有什么意义。只看局部，不見整体，看問題缺乏政治观念，难道不就是这些人的致命所在？在全民办鋼鐵运动中，有些地方多用了一些煤炭，多花了一些劳动力，使那里的鋼鐵成本比較高，这是事实。目前有一部分“土”法生产的鋼鐵質量不好，也是事实。这些問題都需要解决，不努力去解决是不对的。但是从整个工业化运动說来，这些缺点是极次要的方面，是細小的支流，而且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毛澤东同志告訴我們，看問題要分清主流和支流，區別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那些只算小賬不算大賬的人，恰恰又一次忘記了毛澤东同志的教导。

二、普及和提高

工业战线上群众运动的发展，在我們面前出現了普及和提高的問題，以及怎样普及和怎样提高的問題。对于这样的問題，人們的看法也是不一致的。有些同志認為，工业群众运动現在已經到了必須全力提高的阶段。

讓我們首先察看一下工业群众运动的状况。目前，鋼鐵的“小土群”运动已經普遍发展起来，煤炭的“小土群”运动也已經比較普遍发展起来，其他工业的“小土群”运动或者剛才开始，或者还只限于局部的



范围。在现代化企业中，群众运动已經开始发动，但是开展得很不够，一般地說，中小企业开展得比較好，大企业开展得比較差；設备差的企业开展得比較好，設设备好的企业反而开展得比較差。至于地区上的不平衡，不仅在现代化企业的群众运动中存在，在“小土群”运动中也存在。从这些情况看来，当前工业群众运动有普及問題，也有提高問題，但主要是普及問題。

任何一个群众运动，当它确实已經普及而需要提高的时候，如果不去提高，不去解决發生的問題，运动就不能繼續发展，這是我們应当努力避免的。但是，当运动还没有很好地开展，或者只是在局部范围内开展起来的时候，就強調提高，勢必要使运动中断。因此，那种強調工业群众运动現在就要全力提高的主张，是錯誤的。有些同志所以強調提高，正是因为他们看不起普及的东西，也不願意去普及，或者是不想在现代化企业中搞群众运动。甚至有少数人，他們怀疑工业战線上大搞群众运动的正确性，企图采取“收縮”工业群众运动的方針，来反对党的繼續大規模地发展工业群众运动的方針。这些人的錯誤，就更加明显了。

目前工业战線上的群众运动应当怎样普及和提高呢？

現代化大企业是我們工业化的骨干，而且有很大的潜在力量，目前又是工业群众运动中的薄弱方面。因此，应当首先抓紧这类企业，同时抓紧在生产上有重要作用

的中小型現代化企业，把群众运动开展起来。有一些企业的领导干部，还没有完全从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陈旧的规章制度和定额标准的束縛中解放出来，对于外国的一套生产方法和技术規程还有迷信，还不敢革命。有些同志感覺到形势逼人，但是又滿足于已有的成績，只从常規去衡量自己的工作。可見，开展这类企业中的群众运动，还必須从解放领导干部的思想着手。

“小土群”运动，目前应当向各个方面普及。机械、石油、化学、水泥、木材、紡織和輕工业等各个工业部門，无一不可以发展“小土群”运动，也无一不应当发展“小土群”运动。有些人認為“小土群”只是在鋼鐵方面的临时措施，是毫无根据的；“收摊子”的想法，更是錯誤的。要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的工业，必須把“小土群”推广到各个方面，作为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的长远的方針。“土”法生产經過提高未必落后，“洋”法生产不經過改造未必先进，这一点現在已經看得比較清楚。“土”法生产和“洋”法生产相結合，这是我国技术革命的一个方向。經過这种結合，我們有可能創造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技术，正如中医西医合作可以把我国的医学科学推进到世界最高峰一样。

鋼鐵工业的“小土群”运动需要提高，是毫无疑问的。現在就应当着手来提高技术水平，改善劳动組織，改进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同时，应当根据資源、运



輸、劳动力等条件，調整現有的生产点，建立“土”“洋”結合的，包括炼焦、采矿、炼铁、炼钢、轧钢、生产耐火材料在内的小型鋼鐵基地。

普及中有提高，提高中又有普及，不断普及，不断提高，我們的工业群众运动也就越来越向更高級的阶段发展，我們的工业发展速度也就必然会越来越快。

整个工业群众运动存在着一个提高的问题，就是提高人民群众共产主义思想的问题。全民的工业化运动必須同全民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结合起来，做到既有生产的跃进，又有思想的跃进；既改变物质面貌，又改变精神面貌。在生产建設中，人人都应当做思想政治工作，事事都应当有思想政治工作，讓共产主义思想挂帅，繼續发揚敢想敢說敢干的高尚风格，打倒賈桂思想，埋葬教条主义和經驗主义，这样，我們的工业化运动就有了灵魂，有了統帅，也就能够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

三、两种思想方法， 两条工作路綫

要不要大搞群众运动，是工业战綫上两种方法的斗争。实行所謂“正規化”，依靠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办工业，这是一种方法；开展大规模群众运动，依靠全党全民轟轟烈烈地办工业，这是另一种方法。采取前一种方法，結果必然是少慢差費，采取后一种方法，結果必然是多快好省。可

見，两种思想方法的斗争，也就是两条工作路綫的斗争。

是否相信人民群众的創造力，是否敢于发动人民群众去破坏旧世界和建設新世界，历来就是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无产阶级思想和資产阶级思想的一条重要的分界綫。所以，上述两种思想方法和两条工作路綫的斗争，不能不是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无产阶级思想和資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我們党的历史，就是党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干劲、創造精神相結合的历史。在三十多年的革命斗争中，广大干部学会了群众路綫的方法，同群众有紧密的联系。在全国解放以后，我們在工业企业中发动广大职工群众开展了多次的政治运动、增产节约运动和技术改革运动，因而在生产建設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进行大规模工业建設的过程中，由于我們缺乏經驗，有些同志对党的群众路綫发生了动摇，而对于另外一套做法产生了迷信。他們除了醉心于大型企业和“洋”办法以外，在工业管理方面，还片面地强调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实行一长制，只依靠少数技术专家办事，建立整套的规章制度，用物质利益刺激职工的积极性，并且把这些誉之为“正規化”，而把自下而上发动群众，依靠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創造性，广泛地开展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党委集中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领导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等等，贬之为“农村作风”、“游击习气”。有



些同志甚至創造了一套“工业特殊論”，說什么群众运动只适用于政治革命，不适用于經濟建設；只适用于农村工作，不适用于企业工作；或者只适用于小企业，不适用于大企业。他們認為，在工业中搞群众运动，就会“打乱計劃”，“影响生产均衡发展”，“妨碍統一集中領導”，“破坏正常的生产秩序”。在这些同志看来，現代化大工业是神秘的高不可攀的东西，人民群众是无能为力的，无法插手的；在工业化时期，大搞群众运动已經过时。这种做法和这种論調，曾經受到了党中央和毛澤东

同志的批判，并且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抵制，但是，在今年以前，还有一部分干部却不願意改变自己的錯誤觀點和錯誤作法。其結果，就是在經濟建設中削弱了政治思想工作，削弱了党的统一领导，限制了工业战线上群众运动的大規模展开，妨碍了工业建設的迅速发展。現在，彻底丢掉一切錯誤的东西，已經是时候了。我們应当相信，有了一条正确的工业化路綫，又有充滿着共产主义活力的六亿九千万人民，我国在工业上攀登世界高峰，决不需要很长的时间。

长春汽車厂为爭取年产十五万

輛汽車而奋斗

饒斌

一、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

长春汽車厂，按照設計，原是班产汽車五十輛。在今年八月下旬开展了工人参加設計、向班产汽車二百五十輛跃进的运动。这一运动是在深入整风的基础上，經過了多次的群众运动发展起来的。从去年冬天到現在，我們除进行了反对“三风”“五气”，反浪费反保守的双反运动和“两參、一改”运动以外，还繼續用大鳴、大放、大字报、大辯論的方法，討論了三年跃进规划和十五年远景规划，在全厂开展了班产汽車百輛的运动。这个运动冲破了“最高技

术水平不敢更动”、“先进定額不敢突破”、“有节奏生产不能打乱”等迷信。在試制东风牌轎車成功以后，接着又展开了一个月試制红旗牌高級轎車的运动。红旗試制的成功，打开了一条富有革命性的、依靠群众的、高速度地試制新型汽車的道路，使我們体会到了在技术改造方面也可能和必須用群众运动的方法，并在全厂职工中进一步解放了思想，增长了共产主义志气，增强了掌握尖端技术，以及赶上和超过国际水平的信心和决心。在党的“八大”二次會議以后，結合对总路綫的学习，又展开了生产大检查、技术大革命运动。随着这个



运动的发展，我們提出了工人參加設計、向班產汽車二百五十輛躍進的口号。实现了这个口号，就可以使我們厂的生产規模从原来的年产三万輛提高到年产十五万輛。这个口号进一步把全厂的职工动员了起来，投入一个广泛而深入的技术革命和思想革命的运动。經過短短两个半月的时间，我們在生产技术上，主要是設計上，进行了一系列的革命。在产品設計方面，由单一品种到多品种，由卡車到橋車；同时，由仿造到独立創造，使解放牌汽車的结构起了一个突变，即提高了載重一吨，減輕了自重半吨，改善了司机的劳动条件，在很多技术經濟指标上，都超过了美国“道奇”五吨載重車。在工艺設計方面，进行了八百多项的重大改革，很多是尖端技术。在设备方面，出現了设备大革命的苗头，大量采用简易的专用工序机床代替复杂的万能机床。在工厂設計方面，由于产品設計、工艺程序和设备等方面的根本改革，必然促进工厂設計的根本改善。我們根据多快好省的要求，尽可能地挖掘了潜力，做出了只要自力更生地增加少許设备和生产面积，不要国家增加投資，在一年內就可以把生产能力提高到十五万輛的設計。

我們厂經過上面所說的多次群众运动，已經从政治工作走群众路綫，管理工作走群众路綫，发展到技术工作走群众路綫。我們体驗到，在工厂里沒有一項工作不能走群众路綫。只要发动群众，发揚群众的共产主义自觉性，就会出現奇迹。

二、插紅旗、种“試驗田”

班产汽車二百五十輛的运动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开始是领导上指明了方向，群众中出現了先进小组，树起了紅旗，干部种了“試驗田”，取得了經驗，然后全面推开。我們厂在討論远景规划的时候，底盤車間出現了一面紅旗，这就是轉向工部的轉向器壳小组。这个小组的领导人和全組同志在跃进形势的鼓舞下，不滿足于班产百輛的成績，琢磨提前实现工厂跃进规划，爭取更大的跃进。全組同志經過热烈的辯論，在車間党组织的支持下，克服了部分同志信心不足和怀疑以后，大胆地提出了“挖潛力，三不加（不加設備、不加投資、不加人），力爭班产二百五十輛”的革命口号。全組十八个工人在三天內貼出了二百九十张大字报，并且通过在“兩參、一改”运动中建立起来的民主管理小组进行研究，查出了六个关键問題。于是全組工人又集中精力突破关键問題。有一位工人加工轉向器壳，原来的定額是十五分鐘一个，經過多方面的改革，把工时縮短到一分七秒。这时候，这个小组就提出了工人可否修改产品設計的問題。领导上肯定了这个意見，鼓励小组同志对设备的平面布置、工艺过程和产品結構进行全面的研究和革新。經過討論，这个小组达到班产二百五十輛份，不但可以三不加，而且可以三上交（上交设备三台、工作面积五十平方公尺和工人三名）。



厂长和车间主任原先就在转向工部种试验田。当出现了转向器壳小组这面红旗以后，他们就决定首先在这个工部全面试点，然后把经验推广到一些车间。后来党委研究了全面情况，于是决定以工人参加设计、大搞技术革命为中心，在全厂开展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向班产汽车二百五十辆跃进。

三、大辩论

在运动开始以后两周内，群众贴出了大量的大字报，提出十一条建议，其中技术方面的重大措施有三千四百二十项。在这个时候，群众展开了大辩论。辩论的中心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工人能不能参加设计，另一个是在不增加很多设备的条件下能不能高速度跃进到班产汽车二百五十辆。

过去有一些人总是认为，工人只能照图纸生产，设计是专职技术人员的事。设计好了，工人只能按规矩办事，不准过问。有些人甚至认为，设计决定一切，设计好了以后，在工人面前不仅没有设计问题，而且不会有任何技术问题。这种看法实际上就是认为设计以至一切技术只能由少数人垄断。但是，广大工人群众认为，工人不但能够参加设计，而且应当参加设计。通过热烈辩论，彻底驳倒了前一种论调，使大家看清楚了不让工人管技术，实际上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从此，在技术问题上，不管是一个措施，一个草图，一项改革，都在民主管理小组内或小组外鸣放，

辩论之风大盛。工人建议把气刹车改为油刹车的结构，曾三次上设计处，与设计处的同志反复展开大辩论，终于取得了统一的認識，共同决定采用了油气混合刹车结构。

在辩论工人能不能参加设计的过程中，对一部分技术人员提出，要跃进到班产汽车二百五十辆，就需要三千七百多台设备，三亿元的投资和三十万平方公尺的工作面积的初步方案，展开了一场在不增加多少设备的情况下能不能大跃进的辩论。在这个问题上，不仅某些技术人员有很大怀疑，就是有些工人也有怀疑。如工人中有人这样說：“真能出二百五十辆，搞出的零件我就吃了它！”也有人說：“二百五十辆也好办，只要设备、人员翻五番”。这时候，有一批先进的人物带动了一大批群众，他们不仅用大字报作为武器，而且用实际行动作为武器，批驳各种怀疑论调。如底盘车间的徒工张永兴，大破迷信，改进铣床夹具，生产效率就提高了六倍；锻工车间的青年工人李翠艳、姜俊儒改进了冲模，把两道工序并为一道，不但提高了效率一倍多，而且节省了一台锻床。通过这些先进事迹，逐步解除了部分群众的思想顾虑。

四、新面貌

工人参加设计，是我厂工人参加一部分日常生产管理的发展，它更加充实了工人参加管理的内容。工人全面参加了工艺设计、汽车设计、设备设计和工厂设计。这样做，就是让工人参加了技术领导。工



人参加技术领导后，“高速度地发展汽車生产，为共产主义工厂准备好条件”、“汽車零件可以动，工艺方法可以改，工厂布置可以变，只要符合多快好省的总路綫”的口号，深入人心。这样，我們厂就出現了一个新的形势：不管是听到的，或者是書本上看到的，只要是尖端技术，群众就要試，就敢試。不仅如此，工人和技术員在生产中开始研究新的科学原理，如鑄工的平鑄机，按書本上的原理必須有六道型槽，工人認為有三道就行，結果試成了。技術人員开始很惊奇，后来也找出了道理，現在准备同工人合寫一篇論文来推翻过去的陈旧原理。不少車間的工人自己設計簡易机床來代替万能机床，免得机构复杂的万能机床在我們的流水綫上英雄无用武之地。底盤車間的工人只用了十三天時間和花了二百元就做出一台簡易鑄床，能代替現有的六台鑄床。目前全厂已制成簡易高效率的机床百余台。这不能不是設備大革命的开端。

用“展览会”、展览会等形式把技术难题提出来，讓群众选择，这是在技术上走群众路綫的一个方法。开始，我們在試制紅旗牌高級轎車的时候，先把图纸挂出来，把实物展览出来，发动群众来搶任务，誰有本事誰就站出来搶。接任务的人，自己心里总有些底，拿回去再和大家一商量，苦战一番，往往很快就搞出来。这就改变了原来由上面派任务的那套做法。在这种活动中，大大提高了人們的責任心和协作精神。

工人在參加設計以后，思想上也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就象設計新机油泵的工人毛俊杰所說的：“我現在对自己生产的每一个零件都将抱着怀疑的态度，以便寻找方法来改进它。”这就是說，工人們去掉了对产品設計的神秘感，轉变了过去叫干啥就干啥的单纯任务觀點，加强了主人翁的責任心。我們認為这是社会主义企业必須有的特征。

工人参加了技术领导，就逼着技术人員进步。每个技术人員都有他的局限性，他們之中有些人还长期背着自滿的包袱，自以为很行，不相信工人群众的智慧。在生产大跃进的情况下，有許多需要很快解决的技术难题，他們只是憑書本上的一点知識，憑脑子空想，或是只憑人家提供的一些材料来研究，因此，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开始，他們对工人参加技术领导是怀疑的，但是当工人真正解决了他們不能解决的难题以后，就認識到难题再多，只要群众一动起来，就能很快解决；不依靠群众，技术就不能快速地发展。工人們敢想敢干的风格，对他們是一个教育，使得他們在思想上有了一个很大的轉变。

五、“兩參、一改、三結合”

經過发动工人参加技术领导，我們在“兩參、一改”的基础上，进一步摸索到一条新的領導方法，这就是领导干部和工人、技术人員三結合的方法。所謂三結合的方法，实际上就是領導和群众相结合、劳动和技术相结合、技术理論和生产实践相结合。

1958年



合、政治和經濟相結合的領導方法。

我們在大鬧技術革命中体会到，有了難題必須由工人、技術人員和領導干部一起來研究，展開爭論，統一思想，一起苦干，一起下決心解決問題。實行了這種辦法，就可以改變冷冷清清的局面，轟轟烈烈地發動群眾大搞技術革命。比如，第一鑄工車間要達到班產三百輛，長期被認為不擴建就不能解決問題，運動開始時這個車間的局面是冷冷清清的。有人說班產三百輛，要請齊天大聖來變一下才行。但是，結果是“三結合”代替了齊天大聖。這個車間的工人、技術人員和領導干部結合在一起，相繼試驗成功了二氧化碳快速干燥、鐵水里加礬礮提高退火效率等新技術。這下人心大振，干勁十足，全車間從此變得熱火朝天，政治挂了帥，思想解放了，不用擴建就可以達到班產三百輛。

我們在貫徹執行“兩參、一改、三結合”中体会到，在工廠中必須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汽車廠能夠實現革命性的大躍進，是貫徹了黨的總路線和政策方針的結果，進一步證明了黨在其中能夠領導一切，必須領導一切，技術領域也不例外。“兩參、一改、三結合”愈是深入貫徹，群眾運動愈是發展，黨的威信就愈高，群眾就愈要求黨來領導，黨對各方面的領導也就愈應該加強。

這次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使我們廠開始形成了在黨委統一領導下的“兩參、一改、三結合”的領導方法，也就開始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的，又有紀律又有

自由的，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這樣，群眾的先進經驗就能很快地反映出來，並且能很快地加以推廣和貫徹執行。黨委領導下的職工代表大會決定着工廠的重大方針任務，黨委領導下的“兩參、一改、三結合”的領導方法又解決着經常的生產技術工作問題，這就構成了工廠比較完善的新的領導制度。

我們認為，要發展技術革命，不僅必須有思想的革命，而且還必須有管理制度的革命。

六、再向前跃进

“一廠變五廠，年產十五萬”，這個目標現在已經變成了我們廠每個職工的行動口號。我們相信，再經過一年左右的努力，達到這個目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我們並不滿足于這個目標，群眾和領導干部都有再向前跃進的要求。從長遠考慮，我們廠還要向聯合工廠的方向發展。我們不仅要生產汽車，而且要為生產汽車創造各種條件，那就是要靠自己的力量來建設機床廠、電機廠、鋼鐵廠、水泥廠、建築材料廠等等，同時還要和地方工業部門一起發展為汽車生產服務的协作廠。有了這些基礎，我們的汽車製造就能更快地發展，並且能更有力地支援地方工業和兄弟廠。除此以外，我們廠不但搞生產，還要辦各種學校和研究機構，要使每個車間變成既是生產車間，又是設計、試制車間，又是科學試驗研究的車間，又是專科大學。也就是說，要使大



量的工人同志很快就变成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同时使技术人员都成为参加实际生产操作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人，从而为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铺好道路。

我們还考虑到，由于工人的共产主义

觉悟大大提高，参加管理的范围日益扩大，就强烈地要求提高文化和丰富科学知识。为此，在不久的将来，有必要实行四班制，即实行每个职工六小时工作、四小时学习的制度，实际上就是实行半工半读的制度。

在大型企业中贯彻群众路线的一面红旗

刘志兰 房昭文

在包头钢铁公司建设大军的行列中，金属结构公司高炉安装队高举起一面鲜艳的红旗。他们在八、九、十三个月内，以不断革命的精神连续创造了三个快速施工的全国最高纪录。八月里，他们以四十五个工人、三十天时间安装起一座高达七十七公尺、自重三百九十五吨、起重能力四十吨的塔式起重机，比当时同等设备的全国最高安装速度提高了二倍多。九月和十月，他们又以一百二十八个工人、二十天的时间安装起一座有效容积一千五百一十三立方公尺的高炉炉体外壳十七节（全部炉壳二十二节，预计二十六天可全部完成，后因缺材料暂停），比过去九百余立方公尺高炉炉壳安装的最高速度还提高了将近二倍。在安装高炉外壳的同时，在没有增加工人的情况下，又以九昼夜零二十三小时，安装起三座高达四十三公尺、直径九公尺的巨型热风炉（炉顶缺料未安），比过去热风

炉的安装速度提高了十几倍。这件事，轰动了包钢。专家们说这是奇迹。诗人称之为“最红的光速”。

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搞群众运动，大企业的生产也不能例外。而且，企业越“大”越“洋”，技术设备越先进，生产组织越复杂，就越要依靠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大企业优越的物质和技术条件的作用。按理说，这并不是一个很难理解的问题，但是在大企业里，有那么一些人，就爱搬出“大”、“洋”来吓人（也吓了自己），他们把大企业的“技术复杂”，“高度集中”捧上了天，似乎工人只能按照“科学规程”被动地做点工作。他们说，群众运动？那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在大企业里要搞群众运动，就定会“乱套”。

金属结构公司高炉安装队的领导人，



在整風以前也作過“大”、“洋”不能“群”的俘虜。那時工作也做了，但是冷冷清清，少慢差費。現在他們在黨的領導下，在世界上第一流的高爐安裝工程中，大搞起群眾運動。他們一反慣例，無論是制訂計劃或布置任務，都不再象過去那樣簡單地依靠行政命令，而是向群眾講形勢、講任務、講理由、講方法，並且發動群眾大鳴、大放、大辯論。遇到設備缺乏、技術困難等問題，也是通過群眾運動的一套辦法去求得解決。這樣一來，工人個個精神飽滿，干勁十足，雖然生產任務繁重，但還是要練兵、寫詩歌、辦福利、搞展覽。這樣就出現了一個轟轟烈烈、人心舒暢的局面，而在生產上的結果，就是多快好省，大放“衛星”。

群眾發動起來威力無窮，領導上不敢想的，別人做不到的，他們想得出，做得到。熱風爐工程，按公司的年計劃是三個月安裝一座半，隊里第一次提出的大跳進計劃是四十五天安完三座，群眾一討論立即改為三十八天。後來，為了大放“衛星”，隊的黨總支鼓起最大的勇氣，提出了八天安一座的新指標，這個計劃一和群眾見面，工人就主張再加一番，八天干兩座！究竟成不成？群眾立刻展開了大爭大辯。有人說：“四天干一座，沒有五十個合格電焊工，二十四台電焊機不行！”（當時全隊參加熱風爐工程的只有二十八個電焊工，十四台電焊機）“是啊，够嗆……”保守派都出來了！但是，青年電焊工人孫建回答得好：“問題不在于有沒有五十名電焊工，主要看政

治挂帥不挂帥，政治挂帥就能完成。”老工人劉國賢掰着指頭算細賬，證明：“鼓足十分勁，完成任務沒問題”。在黨總支的有力領導下，這些英雄們果然以七昼夜零十六小時安裝起兩座巍然聳立的巨型熱風爐，接着，又一鼓作氣，以兩天零七小時的惊人速度樹起了第三座。

事實證明，正如同發展農業生產和舉辦“小”、“土”工業一樣，在現代化的大企業里，也必須大搞群眾運動，而只要充分發動了群眾，生產的潛力就會是無窮無盡的。

群眾一發動起來，就大破見物不見人的“拜物教”。片面的條件論者是“拜物教”的虔誠的信徒，他們說：“要完成任務，要提高效率麼？拿設備來，拿條件來！”工人說：“東西是死的，人是活的，干嗎讓死玩藝兒治活人！”

高爐安裝隊放出的三次“衛星”，每次都克服了設備方面的許多嚴重困難。他們的設備條件是很差的，起重設備已陳舊，幾乎全部不符合技術規程的要求，但工人們想辦法使廢工具復活，以土代洋，以小代大，保證了高速度施工。比如，安裝四十噸塔式起重機，按照設計需要一台二十一丈高的桅杆起重機，就是按照兄弟單位的先進經驗也必須有一台十二噸的登高起重機。但是這兩項輔助起重設備，他們一樣也沒有！怎麼辦呢？有人認為必須等待設備、延長工期，但群眾不同意，他們說：“困難難不住我們”。老工人出身的工



長詹德榮等提出了一項以土代洋，依靠機身自己安裝自己的辦法。採用這個大膽創造的安裝方法，竟以三十天時間完成了任務，比使用現代輔助起重工具的單位提高效率兩倍多，並且還節省了大量的人工和安裝費用。又如，高爐爐體安裝需要立即開始，但卻面臨着缺電、缺風、缺電焊工等大困難，特別是高爐管沟、除塵器基礎等工程未作完，軌道接不通，早已安好的四十噸起重機無法開到現場啟用。又是一個“怎么办？”又是一場激烈的大辯論！大家爭得面紅耳赤，屋子里辯論不下，就把辯論會搬到現場，邊說、邊算、邊比量。辦法又出來了：用一個小小的十二公尺的鋼管“抱子”（活動拔杆），進行六節以下的爐體安裝。這是一個大膽的創造，就是靠了這個人們瞧不起的工具，在五天之內，安裝了平均每節重達十六噸的六節爐體，向國慶節獻了一份厚禮。

這些事實說明片面的條件論者是完全錯誤的。這個錯誤并不在於他們注重了“條件”，相反，是因為他們沒有全面地看待“條件”，忽視了人的作用，更不懂得“條件”是人創造的，是可以改變的。

群眾發動起來，也就沖破了一些人對於“技術規程”和中外老經驗的迷信。大企業里，受這種迷信束縛的人頗為不少。本來企業是大的、新的，就應該“大企業辦大事，新企業辦新事”，但他們却被这些东西吓住了。動輒“科學設計”、“技術規程”、“國

際標準”、“权威意見”，自己創造了許多“泥菩薩”，然後跪在它面前，碰也不敢碰一下。

工人羣衆是尊重科學的，但他們更尊重實踐。他們根據自己豐富的實際經驗，並不把技術看得高不可攀，而敢于打“泥菩薩”。例如他們安裝的一千五百一十三立方公尺高爐技術是很複雜的，二十二节爐體外殼高达三十九點五公尺，重有三百六十噸，安裝誤差却不得超過二公厘；鋼板焊接縫長達三千多公尺，焊接不合格率却不得超過千分之三。當時全體電焊工人中，參加過大型高爐焊接的只有六個人，安裝前考試全面合格的只有一人，其餘有的是橫焊考試合格，立焊不合格，有的是立焊合格，橫焊不合格。這是一個技術关口。按過去的辦法，就得停下來，重新訓練，這就要拖延建設；如果馬馬虎虎上去，就可能造成嚴重的質量事故。又是一個“怎么办？”有些人缺乏信心，但老工人劉國賢說得好：“我們都是老電焊工，馬上再練練，一個干過高爐的，帶兩個沒干過的，怕什麼，干！那有過不去的山？”領導相信了群眾的力量，決心一下：干！結果十六個電焊工人，憑着高度的自覺性，兢兢業業，奮勇苦戰，出色地完成了任務。經過科學鑒定全部焊接工程質量超過設計要求，合格率達到百分之百，無一處返工。而且通過實踐，訓練了隊伍，提高了技術水平，焊接高爐的速度和開始時比較，平均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在焊接工藝上也創造了許多新經驗。一位蘇聯專



家，參觀了他們的操作之後，盛贊他們的勞動“是一種藝術”，“達到了國際水平”。

他們對待技術難題的辦法就是一條：交給群眾，依靠群眾（包括技術人員在內）。他們曾經發動全體職工，一夜就提出了三百零一件技術革新建議，已經採納的有七十多件。其中有幾件破天荒的革新措施，對於保證這次快速施工，起了重大作用。

人們說：“去年的皇曆，今年用不得了”，正是這樣。這個曾經安裝過八座大高爐的戰鬥隊伍，並沒有把經驗當成“包袱”，更沒有為自己塑造“菩薩”。他們真正做到了：別人做不到的事，敢于做；別人想不到的，敢于想。他們老是向前看，不斷向前进。

群眾起來了，共產主義思想空前高漲。過去，在企業里，不少人對於“計件工資”、“物質獎勵”有很深的迷信。據他們說只有靠這個才能促進生產。但是高爐安裝隊的工人羣眾卻是在“要紅旗，要政治，不要計件工資，不要加班費”的口號下，創造奇蹟的。

在這裡有一個鮮明的對照：工人們說：以前實行計件工資，任務一下來，有些人首先考慮的不是如何保證質量，完成任務，而是考慮“有油沒油”、“是吃肉還是喝湯”（那時流行一種說法：超額百分之百是吃肉，超額百分之五十是啃骨头，超額百分之二十是喝湯）。因此工長室里有時簡直成了“小市場”，挑肥揀瘦，討價還價，爭論不休。有的人虛報冒領，少干多領；有的工人任

務越緊，却越慢慢騰騰的“拿勁”；有的人則不敢多干快干，怕提高定額，怕拿錢過多“顯眼”。所以“計件工資”和“物質獎勵”，在許多場合不僅沒有促進生產，甚至还妨礙了生產的發展。就在那時，雖然有很優越的設備條件，安裝一座八、九百立方公尺的高爐却要花七十五天。現在工地上處處是共產主義思想的光芒，處處是忘我的勞動。工人們一面提出了不要加班費，不要計件工資的倡議，一面把鋪蓋搬到工地上來，日夜奮戰。電火燒紅了電焊工人們的雙眼，也不願到醫務所去，輕病輕傷不下火線；工人們不分工種，不分你我，不分粗細，有什么活，干什么活。有的工人連干四十一個小時不離崗位。領導同志命令他去睡覺，他反問：“你為什麼不睡？”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雖然存在着許多物質條件、設備條件的嚴重困難，他們却以二十六天的時間安裝起一座一千五百多立方公尺的鋼鐵巨人！

人們彼此的關係也起了很大的變化。領導幹部中，單純依靠行政命令、依靠規章制度來領導生產的人沒有了，現在他們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勞動，事事和群眾商量，依靠群眾。工人說，現在領導太好了！技術人員說，只有黨才能領導好生產，只有靠群眾才有辦法。這個隊的黨總支書記說得對：“現在是在黨的領導下，人人動腦，個個動手，心情舒暢，上下團結，越干勁越大。”這句話正是一個恰當的總結。

（編者按：本文作者劉志蘭同志是中共包鋼黨委宣傳部部長、房昭文同志是副部長）



插紅旗，拔白旗

中共湖南省委會

湖南省農村在九月底實現了人民公社化。全省建成了一千二百六十一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六千五百戶。

人民公社運動剛剛開始，我們就碰到了兩個代表人物，一紅一白，分外鮮明。

南縣華東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黨支部書記朱元生，是一面共產主義的鮮艳紅旗。他堅決擁護人民公社，处处為公社的集體利益着想，堅決與個人主義、本位主義、資本主义思想作鬥爭，表現了高尚的共產主義品質。他所領導的華東社，是南縣數一數二的富社。全社三千六百亩土地，有二千一百一十四亩種棉花和黃麻，每亩產值可達一百四十元；其餘種稻，早稻亩產一千四百四十二斤，晚稻亩產也可超過千斤。去年這個社每人平均收入一百三十四元，還有七萬元公共積累，今年全社總收入又可比去年增加一倍。人民公社運動到來的時候，很多人估計這麼富裕的社可能有抵触。事實相反，朱元生帶領全社群眾，在全鄉第一個申請加入人民公社。朱元生說服自己的父母，將私養的已經懷胎的母豬，最先送到公社，痛痛快快地割掉了私有制的尾巴。他还說服了一些社員要求私分公共積累和大宰生豬的錯誤意見，決定全社留下百分之五十的總收入作為公積金。加入公社前夕，這個社還主動地用四

千元買四五條大犛牛、三十多頭豬入社，新造十八只划子，將所有的農具油得金黃，并苦戰了幾天，每亩土地積了一千四百担肥料，作為向人民公社的獻禮。朱元生的共產主义思想的形成，不是偶然的。他出身于有上餐、沒下餐、極為貧困的雇農家庭，一九五三年入党，黨的教育使他在歷次革命運動中一直表現最堅決、最積極。在今年春天搞大競賽時，他領導的華東社就發揚了共產主義的友愛精神，拿出一万二千元支援了競賽的對手寄山社和東方紅社。

浏陽縣星星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生產隊長劉耀琪，是一面資產階級思想的白旗。劉耀琪雖然也是共產黨員，出身于雇農家庭，那時是上無片瓦，下無寸土，佃住三間爛茅屋，天晴晒太陽，落雨屋成塘；如今依靠共產黨翻了大身，一家十口，九人能勞動，去年每月收入一百五十元，虎皮大衣、皮統靴子、紡綢衣、緞子被、紅漆家具、吃的喝的，樣樣齊全。劉耀琪這幾年生活是顯著上升了，家底子厚了，可是，他不但沒有提高自己的覺悟，反而思想蛻化了，忘本了。合作化以來，他逐漸對黨的政策不滿，總感到受限制，不自由。特別是這次建立人民公社，他更大肆反對。在黨員大會上，他大放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謬論，說公社統一分配是窮社沾光、富社吃虧，不合理；說超支戶是懶鬼，要靠富裕戶帶到共產主義，我就不干，欠錢一定



要还，爷还不清恩也要还，还不起連米湯都不給他們喝。說实行粮食供給制是共产主义产生的“新剥削”，劳动力少的戶剝削了劳动力多的戶。他还恐吓地說共产党再这样搞下去，群众就会要不答应了。

朱元生和刘耀琪，这两面旗子，两个对立面，充分反映了在农村人民公社运动中社会主义一共产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二

朱元生和刘耀琪这两面旗子，正是我省当前农村两条道路思想斗争的缩影。

一方面是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已经在迅速成长。

去年冬天，毛泽东同志向全国人民提出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揚敢想敢說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的伟大号召，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群众，产生了巨大的物质力量。祁东县的农民敢于在石山上造林，一冬一春就造了五万亩，使神话变成了现实。邵阳全区二百五十万劳动大军，苦战五昼夜，把山打开了，石凿穿了，山神庙拆了，坟地平了，对支离破碎的小农经济灌溉网来了个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水利自流化。群众說：“水利自流化，万箭一齐发，触天即破，碰地即塌，诸神都退位，讓我来当家。”就在这样的生产大跃进当中，许多农民群众已经把个人溶化在集体里面，一种相信集体、热爱集体、依靠集体、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高尚的共产主义的社会风气正在普遍形成。只要集体需要，只要生产需要，要夜战就夜战，要器

材就献器材，要什么就有什么，一呼百应，踊跃非常。湘乡县智丰乡有一个七十九岁的老人吴汉周，給社里看牛。一天小河陡涨，小牛过不去，老人硬是背牛过河放牧。可是河水太急，連人带牛都被冲倒。老人救牛上岸，自己却被冲到半里以外。經過搶救，老人醒来时第一句話就問“小牛怎样了？”事后，人們称赞他，他說：“牛是社里的，命是个人的，理当如此。”这是多么高贵的品質！在大跃进中，許多合作社为了帮助兄弟社，社員们自带口粮、工具，进行无偿支援。道县雷家洞乡在开展千斤竞赛中，陈家社落后了，大家一商量，全乡二十七个农业社，每社抽調了三个劳动力，在陈家社田间扎营，苦战半月。全乡二百一十个生产队，每社送陈家社两担精肥，送到田里就走，連謝都不要道一声。結果陈家社的“叫化子洞”（地名）变成了“跃进洞”，三类田变成了跃进田。这又是多么高尚的风格！思想大解放促进了生产大跃进，生产大丰收带来了思想大丰收，广大农民当中共产主义思想的迅速增长，为实现人民公社化奠定了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成为运动的主流。

可是，事情总有另外一方面。

我省建立人民公社后，对于今年的收入，都由公社統一分配（在此基础上适当照顾原来各社的差別），实行粮食供給制和工资制，三千二百万农民吃饭不要錢，平均每人无偿供給六百斤口粮，这就开始在一种产品的分配上突破了按劳取酬的范围，具有了共产主义的萌芽性質。这是一場大革命。一部分劳动力多人口少、家庭副业



收入多的上中农和一部分富社社員，由于大勢所趨，他們雖然也同樣敲鑼打鼓，寫申請，送喜報，實際上內心鬥爭很激烈。他們反對公社統一分配，說這是違背按勞取酬的原則，窮社剝削富社，不公平，不合理，他們不甘心。他們胡說共產主義是懶人主義，有利於懶人不利於勤快人。他們以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觀點來理解共產主義，說什麼“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如今搞共產，只有傻子才積極勞動。因此，他們得出一條荒謬的結論：共產主義不能發揮勞動積極性，人民公社不能發展生產。事實上，這種觀點已經在個別上中農的行動中有所表現，比如，有三十歲的成年人要求進小學，不勞動；也有四十歲的婦女要求進幸福院；有個上中農對工資評為四級不滿，生產時只用一只手做事；還有個上中農干脆睡了一個星期不出工。他們的講法是：“干不干一斤半”，“鐵飯碗，打不爛”（指實行供給制每天一斤半口糧靠得住），“按酬付勞，多得多勞”，“評多少級，做多少事”，“一天工資几角，少抽半包煙就省出來了，何必拼命勞動，不如留着這條老命多看看共產主義。”

“秋後算賬派”也看準了這個機會，大肆反攻。他們抹殺事實，誣蔑今年的躍進是“紙上開田結谷，空喜一場”，說什麼“人累得要死，可惜是燕子銜泥空費力”。他們反對今年的先進措施，更反對明年的更大躍進。有的社干部資產階級的本位主义思想嚴重，和“秋後算賬派”同流合污，極力隱瞞產量。如湘潭縣永義亭鄉早稻實際是丰收，建社搞分配時只報畝產二百六十斤；這個

鄉的排頭三分社，今年早稻畝產六百二十斤，只報一百五十八斤，大大低於去年產量。

少數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也從旁窺伺，蠢蠢欲動，企圖乘機破壞。

貧農和下中農在人民公社運動中，表現了極高的熱忱，高舉雙手贊成，堅決擁護。他們對實行糧食供給制，更是興奮異常。但是，即使在他們當中，對人民公社這麼“大”，這麼“公”，大到幾千、幾萬戶，公到由公社統一分配，吃飯不要錢，不少人也是思想準備不足的。由於我們在去年反對資本主义思想的鬥爭中，主要火力是集中在搞臭資本主義自發的剝削思想，對於几千年的私有制在人們思想中所形成的私有觀念還沒有來得及連根拔掉，因此，上中農的個人主義和本位主義等等資產階級思想，就是在一部分貧農和下中農當中也有一定的市場。農業社由初級社升高級社取消了土地報酬，採取按勞取酬的分配原則，大大地發揮了勞動積極性。但有些人把這種分配制度看成至高至上，神聖不可侵犯。他們認為實行糧食供給制，人人吃飯不要錢，不合乎按勞取酬的原則，似乎這樣做是占了上中農的便宜，因而感到理亏。

干部當中，對於人民公社來得如此快，如此大，如此公，思想準備也不是很足的。他們對於人民公社比農業合作社具有更大優越性，體會的深度也很不一致，他們贊成糧食供給制，但也感到不是很理直氣壯。他們對於“共產主義能不能充分發揮勞動積極性”也很擔心，有人就主張一個生產隊設兩個官，一個醫官，一個法官，防止消極怠工、裝病偷懶。群眾中兩條道路的思



想斗争，同样反映在干部队伍中。少数县乡干部闹名誉地位，闹得不轻，说什么“宁为小国之君，勿为大国之臣”。部分乡社干部由于经济情况较为富裕，也产生了严重的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有些社瞒产就是干部带头搞的。

从以上情况看来，很有必要通过人民公社化运动，来一个全民共产主义思想大革命：大破大立，将一切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右倾保守等等白旗或灰旗，通通连根拔掉，让共产主义思想占领全部阵地，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人们的头脑，改造人们的精神面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争取明年的更大丰收，从根本上巩固人民公社。

三

我省农村在实现人民公社化的同时，已经跨进了共产主义思想大革命的第一步。九月和十月的各县三级干部大会，比较集中地进行了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各个人民公社结合处理各项具体问题，也已初步开展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力进行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广大群众在辩论中，用回忆对比、开展展览会、搞历史馆、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用“不靠集体，富能变穷；靠了集体，穷能变富”等等朴素的共产主义思想，猛攻“吃亏论”。十月十五日那天，在寒风霪雨当中，全省人民公社的出工率达到了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七百万工业大军发射出日产三千四百三十七吨钢、一万三千三百七十三吨铁、二十五万九千吨煤的高产“卫星”。一千四

百万农业大军实行大兵团作战，一天就完成了秋收三百三十五万亩，深耕一百四十三万亩，冬播一百九十万亩，积肥十四亿七千万担，副业现金收入一百七十一万元的任务。这一天干的事，超过过去的许多天，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的巨大威力，有力地驳斥了“共产主义不能发挥劳动积极性”的谬论。全省早稻和中稻大丰收，对秋后算账派是当头一棒。

当然，总的说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还只是刚刚开始，我们打算在今年冬天进一步开展。十一月通过分配问题的处理，大破“吃亏论”，大破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在全民中大立共产主义人生观。而后，通过明年跃进规划的制订，总结今年跃进的伟大成绩和经验，宣传丰衣足食的规划，宣传共产主义的远景，大破以“秋后算账派”为代表的各种右倾保守思想，大破苦战三年会累死人的论调，鼓舞广大群众的干劲，争取明年更大丰收。通过为谁劳动为谁忙的讨论，大破共产主义是懒人主义的谬论，大破“干不干一斤半”和“铁饭碗”的思想；大立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热爱集体、一切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的劳动态度。同时，从始至终在全省范围内广泛组织朱元生和刘耀琪思想的讨论。

根据我们的初步体会，开展这个运动需要抓好几个关键。第一、要开展一个千军万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大讲特讲共产主义，让人们懂得将来怎样去实现共产主义，在农村中大大扬起共产主义思想的东风。第二、对照朱元生和刘耀琪的思想，抓住典型人、典型事和典型论



从是否“已經到了共产主义”說起

——有关农村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两点意見 ——

許 立 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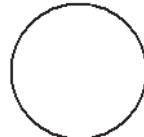
在中央的指示下，各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有的已經展开，有的正在准备展开。为了把这个运动搞好，我們應該研究一下人們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設形势的一些看法。

关于是否“已經到了共产主义”

現在有的人認為，人民公社加供給制，就是“已經到了共产主义”了。有的人覺得我們馬上就会完成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他們还制定了本地区在两年内实现共产主义的詳細計劃。根据这种看法，这些同志觉得現在还提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未免有点“过时”了。这种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但它也反映了一部分人要求向共产

主义走得“快些，再快些”的心情。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我們國內形势发展之快，实在使人应接不暇。生产力奇迹似地发展着。这种猛烈发展着的社会生产力，要求有适合自己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人們在組織了人民公社之后，許多地方又建立了县联社，从而使得集体化的水平更高；許多地方实行了粮食供給制和工資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开始突破了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范围。至于“自願的”、“无定額的”、“不計較報酬”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和协作关系，更是到处发展起来了。这些群众創造的新事物，大大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这些事情說明：毛澤东同志对不断革命理論的发



点，充分发动群众，展开大鳴大放大辯論，大拔白旗，大插紅旗。队队搞展览会，活人活事現身說法。回忆过去，瞻望将来，給群众以最具体最深刻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第三、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同党团员的整风以及整社工作结合起来，由上到下，由党内到党外，层层发动，层层解决。通过这一运动，要选拔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优秀人物到领导岗位上来；对于少数有严重个人主义、本位

主义、右倾思想、工作疲沓、暮气沉沉、屡教不改的干部，要坚决加以撤換。第四、貫彻党的阶级路线。坚决依靠贫农、下中农，采取教育說服和充分鳴放辯論的方法，彻底批判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团结大部分拥护人民公社的上中农，克服另一部分上中农的动摇，揭穿和击退地主、富农的造謠破坏。第五、紧密結合生产。在大抓生产运动当中大抓思想运动，通过大抓思想运动，推动生产走向更大的高潮。



展，大大開闊了人們的眼界，照亮了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今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运动，是在这种条件下展开的，共产主义的红旗，当然举得愈高愈好。

向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必然会遇到的一个問題，就是如何正确处理以下的两个方面：第一，在将来才能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理想；第二，为了达到这个理想的现时的实践。这两者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有两种态度都是不对的。一种态度是把将来的理想，仅仅在口头上談談，不和当前的实践联系，不积极为它的实现准备条件。抱着这种态度的人，对广大群众所創造的包含有共产主义因素的新事物不热情，不支持，甚至还加以阻拦和恐吓。这是保守派的态度。另外一种态度，却是把仅在将来有实现可能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这些同志是热心的，但是也会离开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收到相反的效果。

如果我們以当前人民公社中大多数人十分关心的分配問題为例，那么，这里也存在着上述的两种态度：一种态度認為实行粮食供給制和工資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就是“穷沾富光”，就是“违背多劳多得的原则”，就是脱离了当前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群众的觉悟程度。他們看不到粮食供給制怎样鼓舞了群众的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也看不到这里出現了按需要分配的萌芽，或共产主义的因素。在我国当前农村

中，这种态度在本質上是富裕中农私有制思想的反映，是必須批判的。另一种态度，和上面的态度相反，对于我們很多地方实行“吃饭不要錢”这一伟大胜利，还觉得十分不滿足。抱有这一态度的同志，简单地認為实行供給制的部分越大，就是共产主义越多，也就是越“先进”。因此他們就热衷于扩大供給的項目，急于把劳力多劳力强的人所得的报酬和其他人拉平。这样做的結果，工資津貼部分，或按劳取酬的部分，就大为缩小了。这些同志認為，这样就可以把社会主义社会里残存的资产阶级式的法权迅速缩小，甚至一举加以消灭了。

如果说，前一种态度是对共产主义不热心，甚至还有抵触，那么，后一种态度却是对共产主义“过于热心”，要求过急了。前一种态度的錯誤是显而易見的，我們不去討論它。后一种錯誤态度之所以发生，可能就是由于对当前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群众觉悟程度，作出了一些片面的估計。自然，有些人把“各取所需”神秘化，这是不对的。他們不認為“各取所需”的原則是可以逐步实现的，而是認為一定要在完全实现了“自动化”、“原子化”等等条件之后，才能在一个早晨宣布它的全盤实现。但是，根本不管生产发展和群众觉悟的程度，只憑主观上“善良的願望”办事，也是不正确的。当生产力水平所能提供的个人消費額（在总收入中扣除各項必需的开支和扩大再生产資金等項之后的余额）被口粮占去大部分的时候，是不可能实现各种基本生



活資料和其他消費品的“各取所需”的。这里且以每年消費六七十元的人为例吧，糧食或伙食消耗占了他的消費額的一半或一半以上，剩下的部分就不多了，要想依靠这剩下不多的部分保証各項消費品的“各取所需”，显然是不現實的。在这剩下的部分中，供給的部分越大，工資的部分越小，按勞取酬的原則也就越變得不重要起来，甚至会变成“名存實亡”。北京市的同志在郊区选了一些人民公社算了算賬，又做了些調查，发見“包”得多了，減少收入的戶數也随之而增加，而且，这些減少收入戶，很多是勞力強、人口少的貧農和下中农。这里就提出了問題：現在應該仍然把按勞取酬的原則作為分配制度的基础呢？還是應該把它立即降到不重要的地位呢？如果現在就把按勞取酬的原則降低到不重要的地位，究竟对生产的发展是有利还是有害呢？我們應該以对发展生产是否有利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呢，还是以其他因素作为衡量的标准呢？要回答这些問題，決不能光从抽象的原則出发，除了作周密的研究之外，多听听群众的議論是大有好处的。北京市朝阳区孙河紅光社，今年增产粮棉很多，去年每人平均消費四十元，今年提高到六十八元二角，增加了百分之七十。这个社提出了三种分配方案交給群众討論。第一个方案是按去年的办法分配，即按工分分配；第二个方案，是只包糧食，按劳动情况另发工資（工資数量較多）；第三个方案是“七包”（吃，穿，医，教养，結

婚，生育，埋葬）之后发津貼（錢数比第二个方案少得多）。討論时許多人一夜都不睡觉，討論的結果，多数人贊成第二个方案，并且說，“吃的解决了，多发些錢，对每个人都方便。”有人还說，“按去年办法分配，有‘資本主义’，第三个方案也有点‘过急’了，还是第二个方案好”。这个經濟情況不算坏的公社的情况是这样，那么，有少数經濟情況不太好的社，土地瘠薄地区、灾歉地区的社，情況就看得更明显了。在这少数社里，口糧甚至占了总收入的很大部分，扣了口糧就很难发工資，如果再增加供給的項目，有的就完全不能发工資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考慮实行什么“各取所需”呢？这样，人們可以清楚的看出，沒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則是不能实现的。有的人为了勉强扩大供給制的范围，想了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縮小积累，也就是縮小扩大再生产的范围，另一个是向国家要補貼，要貸款，不归还貸款等等。不用說，这两个办法都是不适当的。

供給制和工資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显然是个好制度。它提供了一种便利于从按勞取酬分配原則逐步过渡到将来的各取所需分配原則的良好分配形式。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群众觉悟的提高，供給制的范围就会由小到大，供給的标准也会由低到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我們就会逐步进入基本生活資料各取所需的阶段。但是，就目前的生产发展水平和群众觉悟程度而論，按勞取酬的原則，就全国范围說，



仍然應該是分配制度的基础。•

这样說，决不是認為可以不去強調政治挂帥了，不去強調發揚“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共产主义精神了。在这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中，必須大立共产主义思想，大破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和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思想，用来促进我們的国家更快地向前发展。我們还要用当前已經出現的許多新事物（例如“吃饭不要錢”），來說明美妙的共产主义远景的实现，并不是什么太遥远的事情了。不过，我們在指出今后远景的同时，还要說明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是不可能的。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只是在严格按照客观規律的条件下促进理想的尽早实现。尊重唯物論，并不是保守派。

关于农村中的几种矛盾

这里还想談的另一个問題，就是在农村展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所面临的人与人之間几种比較重要的矛盾。

公社化以后，地主、富农、残余反革命分子、其他各类坏分子和人民群众之間的矛盾，也即敌我矛盾，并沒有消除。相反，这些敌对分子利用公社化之初人們对某些新事物不习惯而制造謠言，或在生产中进行破坏。鋼鐵工地上盗窃現象也不断发見。社会主义的敌人是不会輕易放下武器的。應該提起注意的，是群众的警惕性在公社化以后有某些松弛的迹象，有些食堂中使用过一些坏分子，就是一例。这是社会主

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中所必須解决的。

除了敌我矛盾，关于人民內部矛盾的表現，这里只談談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有浓厚資產階級思想的一部分富裕中农和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貧农、下中农之間的矛盾。一些富裕农民站在浓厚的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的立场上，对公社化以后家畜、树木等的入社表示不满，并且反对粮食供給制。他們有些人在公社化之后，認為既然不記工分了，因而劳动就可以“磨洋工”了，有的富裕中农說：“公社活，慢慢磨，磨到晌午吃蒸馍。”在实行工資制以后，他們說：“拿几級錢，干几級活”，挑拨工資級別低的社員对工資級別高的社員的不滿。此外，他們又常常是生产上右傾保守思想的代表者。这里的矛盾，常常就是富裕农民残存的資本主义自发倾向和社会主义方向的矛盾。

第二方面，广大的劳动群众对公社化是坚决拥护的，但是也存在着新旧思想的矛盾和其他思想矛盾。他們当中許多人怀疑社太大了办不好，对“三化”不习惯；对送孩子到托兒所有犹豫等等。此外，有些人民公社由于供給的項目过多，使得一些貧农和下中农減少了收入，也引起了新的矛盾。

第三方面，公社化以后，在干部和群众之間的矛盾，也产生了新的情况。固然，絕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他們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現，在各項工作中带头苦干，废寢忘食，但是，也有些干部在公社化获得巨大胜利和广大群众觉悟性和紀律性空前



提高的情况下，对群众路线的作风有所忽略，简单化和强迫命令的倾向有了发展。他们当中有些人，把组织军事化当作了便于实行强迫命令的条件。他们把“辩论”变成了“斗争”的同义语，使得群众听到“辩论”就害怕。在实现生活集体化以后，群众生活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困难问题（例如，实行食堂化以后，各户的灶不经常起火，冬天的烤火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有的干部对此却不大关心。对于群众干劲十足而带来劳动强度过高的现象，有的干部并不注意组织必要的休息，也不注意抓紧技术革命，设法减轻群众的体力负担。他们当中有些人，主观主义的毛病较大，需要改正。另外，也还有极少数的干部，在公社化这一“关”面前过不去了，他们严重抵抗党的方针，有的表示要躺倒不干了，这是在这次运动中必须拔掉的“白旗”。

除了敌我矛盾以外，在各项人民内部的矛盾里，最主要的还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这是不能够模糊的。这种矛盾还会继续到很长的时期。有些人看到人民公社化以后群众的觉悟大为提高，就认为“群众再没有思想问题了”，认为两条道路的思想斗争不重要了，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在这里，首先必须注意的是，要把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严格地区别出来；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包括上面所说的两条道路的矛盾，必须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而不应当采取强制压服的方法。其次，

应该注意不要把一切错误思想都归之为资本主义思想，把一切矛盾都归之为两条道路的斗争。这里需要分析。必须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和在赞同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们之间的新旧思想的矛盾或其他思想矛盾加以区别。虽然两者有时有联系，但是，两者在性质上毕竟是不同的。例如，前面所说的，有些贫农下中农，由于供给制“包”的项目太多而减少了收入，他们也会产生不满。这种不满，就不能一律归之为“资本主义倾向”。而解决这种矛盾，除了要引导他们发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精神以外，还应该考虑调整分配的方法。另外，也不能把一切对生活集体化怀有犹豫情绪的人都称之为“反对生活集体化”，或把这种矛盾一律纳入“两条道路的斗争”。应该具体分析人们发生不满的具体原因，不能简单化。

中央的指示说，“运动的自始至终，都应该按照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充分发扬民主，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场会、展览会等形式，做到真正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使这个运动真正成为广大群众的自我教育运动。”认真贯彻这些指示，是十分重要的。许多地方在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工作中，首先训练一批骨干，实际上也就是让骨干先进行一次小整风，提高他们的共产主义觉悟，启发他们倾听群众意见，坚决走群众路线的自觉。这一步骤，对于开展好这一伟大的思想教育运动，一定会有很多好处。



共产主义的劳动精神

王力

毛泽东同志說：“許多事情看來怪得很，要就沒有，或者很少，要就很多很多。过去九年粮食增加得很慢，老愁粮食不足，可是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几千亿斤。今年翻一番，明年还可能翻一番。这样我們的粮食就多得不得了。鋼也是一样。过去九年搞了几百万吨，今年几个月就可能增加几百万吨。”这就用几句最平常的语言，描写了最不平凡的奇迹。

这个伟大的奇迹是怎么創造出来的呢？毛泽东同志把它归功于人民群众很大的干劲。这种干劲，也就是共产主义的劳动精神。

去年冬季，在我国有上亿的农民为兴修水利而連日奋战。自带工具，自带粮食，不計报酬，并且打破了社界、乡界、县界和省界，人們不是为自己的“近亲”，而是为自己的“远亲”自觉地互相支援，实行劳动大协作。这是什么？这就是共产主义的劳动精神。

今年的鋼鐵戰線上，全国有五千多万人在兴高采烈地連日奋战：开矿、运输、建爐子、炼鐵、炼鋼。同样是自带粮食，不計

报酬，不受八小时工作制的限制。这种忘我的劳动精神是什么？这就是共产主义的劳动精神。

馬克思列宁主义認為，共产主义的劳动就是自願的劳动，是无定額的劳动，是不指望报酬、不計較报酬条件的劳动。这种性質的劳动，在我国已經大规模地組織起来了。正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粮食才可以翻一番，鋼鐵才可以翻一番。同样的，有了这样一个基础，一切任务都可以完成，一切事情都可以办好。

我国人民群众中出現的自願的劳动，已經形成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当广大群众懂得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了他們，沒有私心，和他們一起干；并且懂得共产党提出的每一个任务，对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設，对于加速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具有何等重大意义的时候，人們就都心情舒暢地貢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而把完成这些任务，当做是最大的快乐。当洪水被人制服的时候，当粮棉堆积如山的时候，当鐵水奔流的时候，当共同劳动的果实造福于公共利益的时候，人們高尚而愉快的心情，就是最好的詩人也很难描写得出来。

当人們的劳动具有自觉的共产主义精神时，那就誰也无法規定他們的工作定額。共产主义者的劳动量，从来就是无法規定的。試問，有誰能够規定伟大的革命导师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工作量呢？他們直到停止呼吸之前，除掉自然界規定他們必須要休息，此外是无法規定他們的工作



定額的。作为共产主义者的魯迅，以他的“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名言，一直工作到心脏停止跳动为止，誰也不能規定他的工作量。无数的为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抛头顛的革命烈士們，只有当敌人剥夺他們生命的时候，才談得到結束自己的工作。今天，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无定額的劳动已經形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上海的工人說得好：“过去要加班加点，虽然拿鈔票，还是要三請四邀，并且是請也請不来；今天自願地加班加点，是为了完成革命任务，大家都爭先恐后，并且赶也赶不走了。”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广大工人和农民，当他們正在进行的工作任务沒有完成的时候，就休想动员他們离开自己的工作崗位，正如你要想把正同敌人酣战未休的战士从火線上动员下来一样困难。

共产主义的劳动是不指望报酬、不計較报酬条件的，也是无法計算报酬的劳动。毛澤东同志在“紀念白求恩”一文中所宣揚的真正的共产主义的精神，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当人們具有这种精神的时候，才称得起是一个高尚的人，是脱离了低級趣味的人。魯迅所描写的“吃的是草，挤的是奶汁”，也就是对这种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的頌揚。斤斤計較报酬，斤斤計較名誉地位，只不过是为了个人的富貴二字，这就是低級趣味。

提倡共产主义劳动精神，将使人們逐渐地把劳动看成为乐生的要素，而不单是当做謀生的手段。

共产主义的敌人，以他們那副浸透着損人利己、自私自利的头脑，对这种不計報酬的劳动精神当然是根本无法理解的，他們总是要把共产主义的劳动誣蔑为“奴隶劳动”。这完全是顛倒黑白。在資本主义国家里，劳动者才是皮鞭和飢餓下的奴隶，而只有在我們社会主义国家里，劳动者才脱离了奴隶地位。当然，決不能把中国人民在大跃进中表現出来的苦战精神，看做是只有一个“苦”字。是的，这种有时不分昼夜，不避风雨，不顧工作和生活条件好坏的劳动，确实是一場艰苦的战斗。但是，我們跟“苦战三年”的口号联系着的就是“改变面貌”。“改变面貌”就是甜蜜的果实。在不断的苦战过程当中，就包含着逐渐地改变面貌，人們当然可以享受到这些不断給予的果实。从这个意义上來說，这种不指望报酬的艰苦的劳动，恰恰給予人們最伟大的最珍貴的报酬。这种报酬，就是我国的工农业生产以世界上最高的速度发展，就是人类的最崇高最伟大的理想——共产主义理想将要在我国逐步实现。

我們伟大的祖国，正在轟轟烈烈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設。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从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高級的共产主义社会，必須严格遵守客觀規律和反映这个規律的科学的共产主义原理。这就是必須根据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的指示，必須首先在若干時間內，使我国現有的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逐步变成为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然后再經過多少



年，逐步地以至完全地創造三大条件，即：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質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还必须逐步地以至完全地消灭在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三大差別，即：城乡之間的差別；工农之間的差別；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間的差別。同时，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資产阶级法权的残余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經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合理地組織全民的劳动，不断地发展生产。

正因为如此，馬克思列宁主义，在社会主义旗帜上和共产主义旗帜上，都写了一句共同的話在前边，就叫“各尽所能”。而在后边又分別地写了两句不同的話，前者叫“按劳取酬”，后者叫“各取所需”。人們注意了后边一句互不相同的話，即“按劳取酬”和“各取所需”的差別，这是对的。但是，人們往往忽略了前边一句相同的话，即忽略了“各尽所能”，这就不对了。

既然我国目前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那么，“按劳取酬”的原則当然还起着主要的作用。但是，这絕不是說，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就不去实行“各尽所能”，就不去提倡共产主义的劳动精神。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認為，如果劳动者不肯多做一小时工，不

肯少要一点錢，也就是说，沒有共产主义的劳动精神，就談不上共产主义。只有坚持实行“各尽所能”的原則，不停頓地組織大規模的全民劳动，从而使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以最高速度向前发展，才有可能逐步地創造条件，逐步地增长共产主义因素。与之相反，如果不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各尽所能”，放在組織全民劳动，不是通过劳动实践去創造三个条件，消灭三个差別，而是脱离劳动生产，企图立即完全抛弃“按劳取酬”的分配制度，立即完全实现“各取所需”的分配制度，立即消灭商品交換，立即完全扫除資产阶级式法权残余，那是办不到的，不仅办不到，还会阻碍社会生产力以最高速度向前发展。

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已經消灭了一切剥削制度，消灭了一切生产資料私有制的残余，这就从根本上消灭了为資本主义私有制和資产阶级統治者服务的資产阶级的法权，这也就从根本上树立了无产阶级的法权。在无产阶级法权中，劳动是統治一切的。以劳动的尺度来作衡量，每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中正好領回他所給予社会的部分。因此，它比起一切旧社会来是平等的。但是，这种在消費品分配方面所实行的按劳取酬的平等权利，还是資产阶级式法权的表现。馬克思曾經說过：“在同等的劳动下，亦即在同等享受社会消費品存額的条件下，某一个人在实际上所領得的比另一个人多些，某一个人就会比另一个人富些等等。为要避免这一



切，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这就是說，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因为消費品的分配，不是以人的劳动为尺度，而是以人的需要为尺度，所以人們領取消費品的权利，就不应当也不可能平等的。这样，資产阶级式法权的残余，就完全消除了。

社会分配总是由社会生产来决定的。“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則如何才能逐步地为“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則所代替，基本上取决于社会产品丰富的程度。所謂产品丰富了，是指全国范围來說的，而不是指某一个省区，更不是指某一个人民公社或工厂來說的。只有社会产品极大的丰富了，才有条件实现“各取所需”的原則。还必須了解，即使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完全实现了“各取所需”的原則，社会生产的发展也是永远赶不上人們的需要的。所以人們的需要的滿足程度，也要受一定社会生产数量的控制。这就是說，需要是无限的，滿足需要是相对的，不是絕對的。因此，任何时候，都不應該首先在分配問題上打圈子，而應該首先发展生产。在今天，实行“各尽所能”的原則，发揚共产主义的劳动精神，正是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准备条件的決定性因素。

毛泽东同志經常教导我們要注意关心群众的生活。毛泽东同志有一句名言：“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这就告訴我們，必須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注意改善

群众的生活。毛泽东同志十分关怀苦战中人民群众的利益，經常提醒人們应当注意：劳同逸要結合，苦战同休整要結合，要有节奏地进行生产。要吃饱、吃好，睡足、睡好。大丰收了，不要忘記开个庆祝会，要讓人們吃点肉，喝点酒。毛泽东同志經常提起人們要把群众的长远利益和暫时利益结合起来，这才是完整的群众观点。最近还提醒我們：“在苦战三年当中，积累不可过多，必須使农民越干越有味道，越干越有劲。”这就是說，有了这么大的丰收，农民的生活，是完全可以而且應該适当改善的。农业大丰收了，如果不注意适当地改善农民的生活，显然是不对的。在紧张劳动中，如果不照顧劳动者有充分的休息和睡眠时间，也是不对的。

毛泽东同志經常教导我們，一切革命工作的終极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生产。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政策和做法，都是正确的政策和做法，都是有意义的。而一切不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政策和做法，都是不正确的政策和做法，都是沒有意义的。这就是說，我們的一切政策和措施，都要以有利于发展生产为原則。我們必须紧紧掌握住这一原則，不断地提高执行政策的自觉性，克服盲目性，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更好地把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的劳动力組織起来，充分发挥共产主义的劳动精神，为加速建成社会主义，为加速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而奋斗。





抓 住 时 代 的 精 神

关 锋

再聪明的人，如果不能抓住时代的精神，也是注定要犯历史性的错误的；在我们社会主义时代，更是如此。

我们的时代的精神是什么呢？从根本方面说来，主要的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从必然的王国进于自由王国的飞跃”。

所谓“从必然的王国进于自由王国的飞跃”，就是说，人类由阶级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达到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人们由盲目地受客观规律奴役轉变到充分自觉地利用客观规律改造世界，由作自然界的奴隶到作自然界的主人，由物支配人到人支配物。这也就是说，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历史上任何英雄的創造时代都不能望其项背。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的一个最伟大、最根本的轉变。

今年，我国的实际生活，已經开始了“由必然的王国进于自由王国的飞跃”。今年一年，对于许多人說来，是开阔眼界、破除一切迷信的一年，是更高一步認識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認識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主观作用的一年，是开始抓住时代精神的一年。但是，也有些人，对这个伟大的历史转变，还没有开始理解；在大跃进的形势下，他们显得格外落后了。例如，起初他们对試驗田亩产几千斤的計劃根本不相信，他們認為这是吹牛皮，他們要“观潮”或是“秋后算賬”。等到試驗田亩产几千斤实现了，他們不得不在事实面前“服輸”；但是，他們却認為不能推广，并且照样

反对試驗田亩产几万斤的計劃。試驗田亩产几万斤实现了，千斤县、双千斤县……出現了，他們又不得不在事实面前“服輸”一次；但是，仍然認為亩产几万斤的經驗不能推广，还是照样反对試驗田亩产十几万斤的計劃。总而言之，他們在一件事實上挨了棍子，就只点头承認这一件事實，而在思想上却連半寸也沒有前进。因此，“观潮派”、“秋后算賬派”尽管一次又一次地被事实駁得哑口无言；但是有些人对新的跃进計劃、新的变革，还是要“观潮”，要“秋后算賬”。对人民公社化运动有“观潮派”、“秋后算賬派”；对实行半供给制也有“观潮派”、“秋后算賬派”。当然，这种人

不多了，也不敢大喊大叫了；但是，思想却很顽固。

和“观潮派”、“秋后算账派”的账，是必须算清、算透的。但是，只是摆事实，看来还是不能从思想上把他们彻底算败的。在这一点上，他们是爬行的经验主义者。因此，必须从根本上和他们算账，和他们算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账”，算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账”，算人类和自然界的关系已经达到了一个历史转折点的“账”。只有把这笔账算清、算透，才能使他们从精神上获得解放，把他们拉到时代精神的车子上来。

有人说：现在我国的生产条件、技术条件还很落后，怎么能说已经开始了“从必然的王国进于自由王国的飞跃”呢？这是错误的，是既不见人，又不见社会主义。“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决定的条件并不是生产条件、技术条件，而是社会关系，如恩格斯所说：“因为他们成了自己的社会关系的主人翁”，才“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真正的和自觉的主人翁”。我国在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去年又进行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打垮了右派，实行了全民整风；这样，广大人民就不仅从旧的物质关系中解放了出来，而且也从旧的思想关系中解放了出来。“万事俱备”，再加上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东风”，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就以破竹之势开始了。如

果说，还有少数人在“必然的王国”里，盲目地受着客观规律的奴役，那就是精神上还没有真正进入社会主义时代的那些人了。

难道从生活中不是可以摸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这个我们时代的脉搏吗？

我们都亲身深刻地感觉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不断地涌现出慢说前一辈人根本想不到、就是我们在去年也难以想到的奇迹，而且是愈出愈奇，越来越成了普遍现象。我们应该由此得出什么结论来呢？在我们眼前究竟发生了一种什么变化呢？

请听听无数新民歌中的这样一首吧：

“天爷爷，老皇上！
独裁专制几千年；
庄稼年年你定产，
我们代代受饥寒。
如今要革你的命，
水利建设大发展；
庄稼产量我们定，
从今你永远交大权。”

这首新民歌题为“向天夺权”。它直接说到的和自然界的斗争，还只是水利建设；但是，它却响亮地唱出了我们时代的精神。是的，我们的时代是“向天夺权”的时代，在我国人和自然界的关系由被动到主动、由防御到进攻、由作奴隶到作主人的转变的时代。难道这首民歌所表现的气魄不是广大群众的气魄吗？难道它歌唱的



是少种多收好，还是广种薄收好？

——石楼县建立基本农田的胜利

·中共石楼县委·

粮食产量一步登天

山西省石楼县是吕梁山上一个素称“不毛之地”的贫瘠低产地区。经过一年苦战，粮食产量一步登天，彻底改变了低产面貌。全县十二万二千亩基本农田，除去两万九千亩经济作物外，九万三千亩粮田今年产粮食九千三百三十七万二千斤，平均亩产一千零四斤。与一九五七年亩产四十九斤相比，提高十九倍多，与大丰收

的一九五六年亩产七十四斤相比，提高十二倍多。其中一万七千五百亩玉米，亩产高达一千六百斤，两万二千亩谷子亩产一千零五十斤。加上停耕坡地中农林间作、粮食作物和牧草间作所产的粮食，全县共产粮食一亿零三百八十三万斤。与一九五七年粮食总产一千七百十一万斤相比，增产了五倍多，等于一九五三到一九五七年粮食产量总和的百分之九十。按全县四万零五百多人计算，每人平均粮食由去年的四百二十多斤提高到二千五百多斤。

“向天夺权”不是广大群众日常生活的实践吗？

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当然不仅表现在和自然斗争方面，而且同样地表现在创造自己的社会生活方面。他们的创造性智慧，在各个领域都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挥。有人说：从大跃进以来，六亿人民仿佛都变成了诗人，泱泱中国成了诗歌的海洋。是的。在科学方面也是这样：六亿人民仿佛都变成了科学家，泱泱中国成了科学的海洋。一年，仅仅是一年，新的发明创造有多少啊！打破了多少古老的教条！

冲破了多少旧有的相对真理而把它大大向前发展了啊！

如果面对生活，并稍微思索一下，怎能不感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这个时代的脉搏在跳动呢！

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主观作用究竟有多大？现在我们只能在原则上知道：自觉地充分地利用客观规律；而在实际上是望不到边的。因此，问题就不仅是要从根本上和“观潮派”、“秋后算账派”算账；而且每一个领导者都要经常地问自己：你抓住了时代的精神没有？



論条件石樓县很差

提起石樓县粮食总产量翻五番，亩产打破千斤关，可能有些人不相信。因为这个县地势很高，在海拔一千公尺以上；气候寒冷，无霜期仅仅一百三十天；水上流失很严重，每年流入黄河的泥沙达四千五百九十六立方公尺；地广人稀，劳力缺乏，每一平方公里的面积上才平均十个人，每个人平均九亩多耕地。这些耕地多是五十度左右的陡坡地，耕作条件十分困难，从来是“粮食过斗（亩产三十斤）好年成”的低产地区。可是，恰恰就在这“不毛之地”，今年粮食亩产达到千斤以上。

变广种薄收为少种多收

石樓县粮食高额增产的主要经验，是遵循党的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耕作制度上进行大变革。这就是：坚决改变广种薄收的旧道路，采取了建立基本农田、种少、种好、多收的新道路。全县由去年的三十八万亩耕地减少为十二万二千亩基本农田。其他的土地，改作植树造林和种植牧草（今年春夏两季，已经造林十四万一千亩，种植牧草两万亩）。为了把基本农田种好，他们完成了打壠工程九万八千亩，并利用洪水淤成沟地五万亩。对原有的四万一千亩沟川地大力进行了平整土地和水利建設，灌溉面积由原来的五百

亩扩大到一万三千亩。全县的基本农田，經過各种基本建設和其他技术措施，都获得了高额丰产，因此，群众反映說：“好田不論亩，一亩頂百亩。”

石樓县获得空前大丰收的事实証明，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建立基本农田制度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第一，因为改变了广种薄收的耕作制度，就能集中人力物力建設好基本农田。第二，只种山沟中的土地，可以充分利用山坡上冲刷下来的朽草腐木和牲畜粪便，增加土地肥力，可以利用山上的洪水和沟中的泉水浇灌。由于沟地平坦，便于耕作，便于实行运输車輛化，也便于将来实行耕作机械化。第三，由于停止种黄土山坡地，大量植树造林，种植牧草，結合沟中打壠淤地，就可以迅速有效地保持水土，并逐步发展林牧副业等多种經濟。

开展辯論，統一思想

建立以打壠淤地为中心的基本农田制度，彻底改变几千年来人們已經习惯了的广种薄收的道路，是經過了一場思想斗争的。在县委第一次討論如何实现基本农田制的时候，就遇到了右倾保守思想的抵制。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提出在现有耕地中，选择較好的坡地修梯田的主张，与全部停耕坡地、打壠淤地的意見相对抗，他們断言停耕坡地是“冒险”，說打壠淤地是“劳民伤財，費力不討好”。他們实际上是对



种少、种好、多收的新道路，主张仍然走广种薄收的老路。当时，必须解决摆在人们面前的这个分歧，要么是用革命的办法实现大跃进，要么是仍然在原来落后的基础上停滞不前。不解决这个分歧，不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要实现农业生产上的这一根本革命，显然是不可能的。为了澄清思想、统一认识，县委决定由不同主张的同志分头进行调查，展开辩论。主张建立以打壩淤地为中心的基本农田的同志用十天时间与乡社干部一起，在六个乡中详细勘察了有代表性的十二条沟壑，走马观花地看了三十条沟壑，并且采用群众路线的方法，总结了前进农业社实行停耕坡地、打壩淤地、保持了水土、粮食大大增产的经验。县委根据调查结果结合全县的自然情况进行了分析，证实打壩淤地的主张完全可以在全县推行。这的确是使农业大跃进的一条多快好省的路线。而在坡地上修梯田，不仅费工多，短期不能完成，就是修成梯田，也要给车辆运输和将来的机械化带来很大的困难。事实同样证明，这是一条少慢差费的路线。辩论结果，县委绝大多数同志同意了建立以打壩淤地为中心的基本农田的意见，作出了实行这个新制度的决议，规定了实现这个新制度的具体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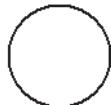
继领导干部的辩论之后，又在全县人民中展开了对建立基本农田方案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县委针对群众的思想情况，提出了几个辩论的题目：是广种薄收

好呢，还是少种多收好？是在坡地上修梯田好呢，还是建立以打壩淤地为中心的基本农田好？这两条路线哪条是多快好省，哪条是少慢差费？由于县委的方案反映了广大群众长期以来对于改变低产、贫困面貌的迫切要求，辩论又是用群众熟悉的事例进行算账对比的方法，因此，很快就获得了群众热烈的拥护。经过辩论，思想统一了，方向明确了，人人意气奋发，个个斗志昂扬，群众到处开誓师大会，纷纷写决心书，报名参加建设基本农田大军的达到一万余人。

依靠群众，势如破竹

实行基本农田制度，是耕作制度的大变革，是向自然进军的一场严重斗争，决不只是缩小一些耕地面积而已。要把基本农田建立起来，要在放弃的坏地上造林和种草，都必须克服许多困难，付出艰巨的劳动。石楼县委切实做到了政治挂帅，坚定不移地依靠了广大群众，因而战胜了一切困难。

为了进行这项改造自然的战斗，石楼县建立了建设基本农田指挥部，由三个县委书记和县长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他们从全县抽出五千六百多个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百分之三十二），并从各部门抽出二百名干部作为领导骨干，按照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的原则，组成了五个团。同时，还把卫生保健、商业供应、文化娱



乐等力量，统统编入各个连队，实行领导一元化，生活集体化，食宿在工地。

战斗开始时，首先碰到两个问题：第一，用什么材料打壩？打什么样的壩？有人主张用洋灰等高级材料打壩。可是，这些材料县里一无所有，也拿不出一笔巨款购买。更多的人则主张就地取材，有土就打土壩，有石头就打石壩。指挥部坚决支持了后一种主张。第二，选择什么地形打壩？谁来设计？在这方面，许多人没有经验，县上又没有这种技术人才。怎么办呢？指挥部领导各个连队普遍开展了献计运动，结果找到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土办法，发现了二百名土专家。把这些土专家和水土保持站的技术人员抽调出来，就组成了四个专业勘察队。于是边勘察、边设计，就这样进入了战斗。在战斗过程中，县委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以提高劳动效率，

保证工程质量。县委并领导群众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前方与后方、团与团、营与营、连与连、排与排、班与班、人与人和不同工种、不同行业之间的社会主义劳动大竞赛。通过定期的和随时的检查评比，表扬了各方面的先进单位和英雄人物，激励了群众的革命干劲，调动了一切方面的积极因素。

经过一年的苦战，石楼县的人民建立起了新的基本农田，多快好省地控制了水土流失。就在这个胜利的基础上，石楼县人民赢得了一九五八年的大丰收。现在，石楼县已经成立了统一的人民公社，计划明年要在农业生产上争取更大的丰收。为此，每人平均只种两亩基本农田，其中一亩小麦，半亩秋粮，半亩经济作物。亩产计划是小麦双千斤，秋粮四千斤，籽棉一千斤，油料一千斤，蔬菜一万斤。

鹤子翻身

·胡正山·

收回河南翻地经，
“鹤子翻身”四尺深；
深耕直捣閻王穴，
麦穗顶破九霄云。

(原载“新湖南报”)



深耕细作(剪纸)

滕鳳謙

开展大面积的高额丰产运动

閻 达 开

一九五八年是社会主义建設全面跃进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同其他兄弟省份一样，河北省也出現了史无前例的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和共产主义思想大解放的新形势。就农业生产情况来看，預計今年全省粮食总产量可达到四百五十亿斤，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一百二十八；棉花（皮棉）总产量可达到十六亿斤，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一百五十六；花生总产量可达到十二亿斤，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一百四十四。但是，我們并不滿足于这些成就。我們在农业战綫上的新任务是繼續推動农业生产实现更大的跃进，生产更多的农产品来充分地滿足人民生活、工农业建設和其他方面的需要。这个任务能不能完成？通过什么道路来完成？对这个问题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認為，“跃进已經到頂，不能再跃进了”，“一亩、二亩小面积的高产还行，大面积就不行”。我們根据今年的生产經驗，却作了与这些人相反的回答，我們認為，明年的农业生产不仅能跃进，而且能以更高的速度跃进；不仅可以搞高产卫星試驗田，而且可以搞大面积的高产卫星試驗田。

这是有事实做根据的。今年河北省的农业生产虽然出現了大跃进的局面，但是，全省粮食平均亩产量才只有五百三十七

斤，棉花平均亩产皮棉才只有一百一十斤，花生平均亩产量才只有三百七十三斤。这样的平均亩产量和高额丰产的卫星田的亩产量相比，是相差很远的。据不完全的統計，今年河北省亩产粮食一万斤以上的卫星田就有三百五十多亩，还有亩产千斤皮棉以上的棉田，亩产万斤以上的花生田，和亩产千斤以上的芝麻田。既然这些田能高额丰产，为什么其他田不能高额丰产呢？事實証明，今年这些卫星田的耕作措施，除极个别的以外，是可以而且能够在大面积的土地上推广的；这些田能放“卫星”，其他田也应当能放“卫星”，小面积的卫星試驗田，可以变成大面积的卫星試驗田。关于这一点，如果拿今年和去年做一个比較，那就更清楚了。去年全省粮食亩产千斤以上的只有九个农业社，今年則出現了二十五个粮食亩产千斤以上的县（市）；去年只有石家庄市棉花亩产皮棉超过一百斤，今年則实现了百斤皮棉省，并有十五个县（市）棉花亩产皮棉二百斤以上；去年花生只有个别的千斤亩，今年則出現了千斤县。由此可见，一九五八年的农业生产大跃进，卫星田和高额丰产县的出現，不仅揭开了农业增产潜力的秘密，而且揭示了农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卫星田的



面積將由小變大，高額豐產縣將由少變多，農產品的總產量將會繼續增高。

河北省委在党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認識了農業生產發展的這個必然趨勢，確定從一九五九年開始，在全省範圍內開展一個大面積高產衛星試驗田運動，培養一千八百萬畝高產衛星試驗田（占全省耕地面積百分之十五）。其中種糧食的一千五百万畝（主要是小麥、水稻、谷子、多穗高粱和玉米，不包括甘薯），爭取畝產五千斤到一萬斤；種棉花的二百萬畝，爭取畝產皮棉五百斤到一千斤；種花生的六十萬畝，爭取畝產五千斤到一萬斤；種芝麻的四十萬畝，爭取畝產五百斤到一千斤。

我們相信，只要加強黨的領導，只要充分推廣和認真提高已有的高產衛星試驗田的成功經驗，認真地把水利、施肥、改良土壤、選用良種、密植、防除病蟲害、工具改革、管理園田化等等措施搞好，這一任務是能够完成的。從今年各地的經驗來看，谷子選用良種，密植勻播，每畝二十萬株左右，足水、足肥、徹底消滅病蟲害，畝產萬斤是有把握的；多穗高粱，只要認真推行深耕淺種、密植萬墩左右、並用一部分速效肥作底肥等技術措施，實現畝產萬斤把握就更大；棉花，為了解決通風透光的問題，可以實行沟壟密植的種法，隔兩壠種兩壠，再加上其他必要的措施，畝產皮棉五百到一千斤，也是完全可能的。

為了實現大面積高產丰收，領導農業生產的方法也要大大改革。成安縣在這一

方面為我們提供了成功的經驗。他們把一畝或一千畝適合種植同樣作物的土地劃為“豐產方”，爭取千畝千斤方、萬畝千斤方。這個經驗在今年的棉花生產上已收到顯著成效。他們的十五萬畝棉花“豐產方”，占總植棉面積的百分之四十四，產量却占總產量的百分之六十二，畝產皮棉達到三百五十斤。他們的“豐產方”是怎樣搞起來的呢？在今年大躍進的初期，由於試驗田地塊分散和領導不集中等原因，許多社往往只抓緊了衛星田，而忽視了大面积豐產田的增產措施。在這種情況下，道東鄉提出把零星的小塊試驗田和豐產地連成大塊“豐產方”的計劃。他們把六個社的土地規劃在一起，固定勞力，統一措施，統一行動，分段負責，確定為萬畝千斤方。縣委發現這個情況以後，經過分析研究，認為這樣作既能樹立典型，又能推動普遍豐產，是把試驗田的豐產經驗普及到一般田去的好方法。因此，決定在全縣範圍推廣。今年全縣已出現了一百七十個“豐產方”。成安縣實行這一方法的結果，不僅使棉花普遍增產，並且為實行少種多收的新耕作制度奠定了基礎。

大面積高產衛星試驗田是今年小塊衛星試驗田的進一步發展，我們決心爭取大面積高產衛星試驗田試驗成功，明年試驗不成功，後年接着試驗，兩年不行搞三年。當然，在大力搞大面積高產衛星試驗田的同時，決不能忽視或放鬆一般田的管理，還必須採取應有的措施管理好一般田，

(1)

1958年



力爭全面躍進，全面丰收。

如果我們的大面积高产卫星試驗田的計劃實現了，光一千五百万亩粮食作物，就可以产粮食七百五十亿斤（每亩按五千斤計算），只此一項，全省四千五百万人，每人就能平均达到一千六百多斤粮食；要是按亩产万斤計算，每人平均則为三千多斤粮食。我們力爭明年实现小麦千斤省，如果这个計劃實現了，下茬就可以少复播。秋季如果实现了大面积高产卫星試驗田的計劃，从一九六〇年开始，就可以爭取大大减少作物的种植面积。这样，我們就有可能在二、三年内实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三分之一的土地种庄稼、三分之一的土地休闲、三分之一的土地綠化的新的耕作制度的倡議。由此可見，有組織有計劃地培养大面积的高产卫星試驗田，不仅是促进农业更大跃进的关键，而且也是改革农业耕作制度的重要步驟。

培养大面积的高产卫星試驗田，逐步推行深耕、細作、少种、多收的耕作制度，是农业生产上的革命，是今后发展农业經濟的根本問題。实行这种耕作制度，将产生深远的經濟意义和政治意义。

第一，可以把所有的作物都种在土壤肥沃、旱涝保收的土地上，可以集中地使用水利、肥料和人力。这样，作物的生长条件就更加优越了，各种作物的产量就可以飞跃地提高了。

第二，因为縮小了耕地面积，就可以腾出土地和劳动力来有計劃地全面发展林

业、畜牧业、副业、渔业、园艺等多样性的生产，加速园林化的建設，这样就不仅可以做到有足够的粮食、棉花和油料，同时，还可以有充足的畜产品、水产品、林木产品和蔬菜、瓜果等来滿足群众多方面的需要，大大地改善人民的生活。

第三，可以提供足够的劳动力和更多的工业原料支援国家工业建設，大量发展社內工业，作到工农結合，亦工亦农，逐步消灭工农之間的差別和城乡之間的差別。

第四，可以騰出力量搞水利、开河网、修公路、建住宅、美化家园等等，改善生活环境和居住条件。

第五，可以大大緩和劳动力的紧张程度。在实现了少种多收以后，可以逐步減少劳动时间，以便抽出更多的时间学文化、学理論、学习科学技术，开展体育和文化娱乐活动，从而改变人們的精神面貌，增进身心健康，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間的差別。

推广大面积高产卫星試驗田和逐步进行精耕細作、少种多收的耕作制度，有着重大的革命意义，絕大多数群众是会积极拥护的。但是，因为它和几千年来沿用的浅耕粗作、广种薄收的耕作制度相对立，因此，在推行大面积丰产和逐步实行新的耕作制度的时候，还势必会遇到习惯势力和保守思想的阻碍。有的人認為：古今中外都沒有这样作过，这样做是行不通的，是一种冒险；还有的人怕“摊本大，費用多，不合算”，或担心这样做影响到一般田



一个办得很象样子的

公共食堂



山西省五寨县火箭人民公社东寨生产队公共食堂的簡要介紹

·范若愚·

山西省五寨县火箭人民公社东寨生产队的公共食堂，当地群众都說它“办得很象样子”。的确，这个公共食堂，同其他一切办得好的公共食堂一样，已經鮮明地呈现出我国人民新的生活方式的美妙图景来了。

东寨生产队的公共食堂，从成立到现在，虽然只有五十多天，却经历了两个显然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实行粮食供給制以前，是吃饭記賬、按年龄定饭量、带饭回家、以生产小队为单位的五个食堂。当时，虽然把許多妇女的劳动力，从家务瑣事中解放出来了，但是，还有許多問題沒有解决，有人还怀疑公共食堂的优越性，甚至怀疑公共食堂能否长期存在下去。实行了

粮食供給制以后，把五个食堂合并为一个吃饭不記賬、不受定量限制、集体吃饭的大食堂。这时，进一步加强了領導和管理，公共食堂的优越性大大地显现出来了。群众說：“我們的食堂办得象个样子”。

粮食供給制和公共食堂

实行粮食供給制以前，大多数人虽然吃饱了，但是，有些人口多、劳动力少的戶，生活就有困难；少数饭量大的人，还不够吃；而吃得饱的人中，有的则存在着浪费剩饭的現象。因此，不够吃的人不满意地说：“盛一石的，八斗滿不了”。实行粮食供給制以后，人口多、劳动力少的和饭量大的人，也不愁吃不饱了。社員們高兴地

的增产。所有这些看法，都是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沒有看到人民公社化以后的变化，沒有看到生产全面跃进的新形势，沒有看到社会主义建設的前景；而是用小农經濟的眼光看社会主义的大生产。現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問題，是墨守成規呢，还是不断革命？是小跃进呢，还是更大的跃进？是广种薄收呢，还是种少、种好、多

收？显然这里有斗争的。这种斗争是先进与落后的斗争，是多快好省与少慢差費的两种方法的斗争。为了順利地开展大面积的丰产运动，我們必須充分发动群众，通过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报，总结丰产經驗，算賬对比，支持先进，批判落后。大破跃进到頂、滿足于現状的思想，大立不断革命、更大跃进的思想；大破墨守成

說：“糧食供給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从東寨舉辦公共食堂的情況看來：不實行糧食供給制，要办好公社化的公共食堂，困難很多；不好好公社化的公共食堂，糧食供給制也很难通過其他更適當的形式來實現。公社化的公共食堂，是一種共同消費的形式，也是群眾創造出來的按照需要來分配糧食的形式。

集體吃飯和簡易飯廳

第一階段，因為沒有飯廳，不能實行集體吃飯，打飯回家，常吃冷菜冷飯。在刮大風下大雨的時候，坡陡路滑，往返不便，甚至有人會把罐子打了，飯也撒了。第二階段，因為有了簡易飯廳，實行了集體吃飯，就能吃到熱菜熱飯。吃飯的時候，也不受風吹雨淋和凍了。過去打飯回家，分散吃飯，連打帶吃，每餐飯至少需要一個半鐘頭，如今在飯廳集體吃飯，每餐飯只需四十分鐘。為了實行集體吃飯，修建了一個簡易飯廳。這個飯廳是在建築材料和勞動力十分缺乏的條件下修建起來

的。建築材料只花了四十八元，其餘材料都是拆舊建新，多方收集的；建築用工四百個，除了水泥工六人和壯年四人外，其餘是由二十個小學生做的。他們鼓足干勁，克服困難，在二十天內，就建成了一所可容四百人同時吃飯的簡易飯廳。這個寬敞、明亮、清潔、朴素的簡易飯廳，又作課堂、會場和俱樂部之用。有了這個簡易飯廳，就保證了經常能夠集體吃飯，而在食堂集體吃飯比起只由食堂集中做飯而不集體吃飯，是更能充分提高勞動利用率和生產率的。

以生產隊為單位建立公共食堂

在第一階段，五個小食堂共設事務員五人，炊事員十人。到了第二階段，合併為一個大食堂以後，只設事務員一人，炊事員七人。過去五個小食堂每月共需煤炭、燈油、紙張等費用三百二十九元三角五分，現在一個大食堂，每月只需二百零五元六角五分。過去的五個小食堂由於分散管理，在人力物力上都產生了一些困難，

規、小手小腳的作風，大立敢想、敢說、敢做的共產主義風格；大破小農經濟的耕作制度，大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耕作制度。

在開展大面積的豐產運動和推行新的耕作制度方面，我們還缺乏經驗，還需要通過實踐繼續摸索和豐富這些經驗。這件事情能不能做好，關鍵在於黨的領導，政

治挂帥。各級黨組織要從始至終地抓到底，抓思想，抓規劃，抓措施。同時，要把耕作制度的改革與文化革命、技術革命密切結合起來，從而在思想上、作風上、技術上掀起一個革命高潮。拔白旗，插紅旗，保證大面積高額豐產運動的勝利，為全面地推行新的耕作制度樹立一個良好的开端。



再加上工作上的缺点，有些食堂就办得不大好；又因各个食堂开饭时间不一致，有的出工早，有的出工晚，这就又使得一个生产队的行动不能一致。在合并成为一个以生产队为单位的公共食堂以后，就没有小食堂的这些缺点了。这就说明，在居住比较集中的条件下，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一个公共食堂，比在一个生产队内分设几个食堂，是更经济、更合理、更有利子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

党支部大力领导，干部亲自动手，党团员带头

举办公共食堂，虽然得到了大多数群众，特别是妇女群众的热烈拥护，但是有些人曾有过怀疑和顾虑，也有少数人是反对的。党支部发动群众进行了大鸣大放大争大辩，通过几次鸣放辩论，宣传了共产主义，宣传了公共食堂的优越性，群众的觉悟提高了，某些人的怀疑和顾虑逐步消除了，反对的意见也被驳倒了。党支部不仅政治挂帅，而且具体地领导了公共食堂的工作。公共食堂建立不久，党支部就注意到了因为没有饭厅造成的许多困难，很快地下了决心，修建简易饭厅。为了适应老人和小孩的需要，照顾产妇和病人的营养，现在又筹建第二饭厅。为了使饭菜多样化，党支部委员兼生产队长闻柱世同志亲自下厨房，做出了当地群众从来没有吃过的饭菜。在挑选炊事员的时候，有些人不愿意做这个工作，闻柱世同志就动员自己

的老婆樊旺英（共青团员）去作。在开办公共食堂的时候，没有粮食，党团员就首先拿出了家里的存粮。在刮大风下大雨的时候，有些老人和病人不能到食堂吃饭，党团员就把饭菜送到他们的家里，有时饭做得少了，就让群众先吃，然后再作饭给党团员吃。党支部大力领导，干部亲自动手，党团员起带头作用，公共食堂怎么会办不好呢？

优秀的食堂工作人员

公共食堂的七个炊事员是从优秀的女社员中挑选出来的。她们都是生产模范，三个得过物质奖励，四个受过口头表扬，有两个曾是生产小队长。她们每天早起晚睡，做在人前，吃在人后，有人因事外出，她们就给留饭；社员下地劳动不能回家，她们就给送饭。她们想尽办法，改善伙食。她们很讲卫生，把厨房饭厅收拾得很干净。她们这种为群众服务的精神和积极的工作态度，受到了全村居民的关怀和尊敬。应当说，东寨公共食堂所以办得很象个样子，是和这些政治进步、热心于公共食堂工作的炊事员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

民主的管理制度

公共食堂设有伙食委员会，由妇女、青年、老人的代表和热心于公共福利事业的积极分子组成，负责审查账目，反映群众意见，协同食堂管理人员制订饭单，并交群众讨论。饭厅建成以后，缺少炊事用具，



沒有桌凳，伙食委員會就发动大家湊集。群众发现爐灶用煤太費，就向伙食委員會建議，改建爐灶，使用风箱。食堂設事務長(隊保管員兼)、事務員各一人，管理食堂的日常工作。炊事班有炊事員七人，設正副班長各一人，炊事員每天輪流值日，值日員負責統計吃飯人數，檢查廚房飯廳衛生。全體居民編班吃飯，固定座位，也輪流值日。开飯号响，各就各位，由各班值日員領取飯菜。四百多男女老幼天天这样一起吃飯，心情舒暢而秩序井然。

吃得又飽又好又節約

公社規定的口糧標準是四百五十斤。該隊所產的糧食有八種，山藥蛋占口糧的百分之四十四以上。公共食堂制訂飯單的方針是：多吃產量多的糧食，少吃產量少的糧食，增添副食品，設置調味品，粗細搭配，變化花樣，每逢節日，舉行會餐。此外，食堂還養了豬，并計劃種菜，做醋做醬，用以改善伙食。採取這些辦法，就保證了在規定的口糧標準範圍內，能夠吃得又飽又好。

公共食堂和發展生產

東寨办好公共食堂的結果表明，舉辦公共食堂不僅關係到社員的分配問題和消費問題，更重要的是關係到發展生產的問題。褚三女過去每個月只能做十五個勞動日，自从參加了公共食堂擺脫了燒火做飯

的家務勞動以後，每個月就做到二十九個勞動日；郭改女去年十月份共做二十三個勞動日，今年十月份就做了三十八個勞動日。全隊八十六個女勞動力，去年十月份實做一千七百三十六點六個勞動日，今年十月份共做了二千六百七十點九個勞動日，比去年同期多做了九百三十五點三個勞動日。由於舉辦公共食堂進一步解放婦女勞動力，每年以十個月計算，就可以增加一萬零二百八十八個勞動日。全隊九十四個男勞動力，由於舉辦了公共食堂，每人每天可以增加勞動時間一個半小時，每個勞動日以九小時、全年以十個月計算，全年就可以增加五千一百七十個勞動日。以上兩項合計，全年可以增加一萬五千四百五十八個勞動日。假如把這些由於舉辦公共食堂增加出來的勞動日，全部用於農業生產，就按照該隊今年每個勞動日收穫糧食十五斤的標準計算，也可以增產糧食二十三萬一千八百七十斤，等於該隊今年糧食總產量四十五萬斤的一半以上。由此可見，舉辦公共食堂，實行集體吃飯，是發展生產的一項重要措施。

東寨由於辦好了公共食堂，出現了許多可喜的新氣象：社員的干勁更大了，共產主義的思想覺悟提高了，社員之間更加團結了，建設人民公社的信心更足了。這一切，都說明了办好公共食堂乃是當前鞏固和发展人民公社的重要關鍵之一。

